

何竟如此

TO WHAT PURPOSE?



# 目 录

|                |    |
|----------------|----|
| 中文版序.....      | 1  |
| 序言.....        | 6  |
| 抵华时的中国时局.....  | 7  |
| 原本可以在英国行医..... | 9  |
| 学习中文的学校.....   | 13 |
| 学习忍耐的学校.....   | 19 |
| 穿越戈壁沙漠.....    | 26 |
| 中国的新疆.....     | 42 |
| 最后的信函.....     | 46 |
| 至死忠心.....      | 54 |
| 何竟如此? .....    | 55 |
| 尾声.....        | 60 |
| 译后感言及附录.....   | 61 |

## 中文版序

巴富羲医生能够听从主的召唤,舍弃英国舒适的生活与高薪待遇,义无反顾地到中国来传扬主的福音,甘心奉主差遣,深入边远艰苦的新疆为主作工。乃是出于他对主大爱的深切体会,以至于乐意为主背十字架,为主舍命。他也果真为主舍了自己的性命。

我由此想到他的父母从小教养他,把他带到主面前的重要性。

箴言 22 章 6 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句话是神给我们作父母的要求和应许,我们都应当切记与遵行。

中国的传统十分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孟子之母为了儿子的教育而三次迁移住处,至终使孟子成为中国有史以来,能够与孔子齐名的学者。由于我生长在河南开封,这个故事从小就知道,而且印象极深。我的爸妈教育我们,其实堪与孟母媲美,他们十分注重在主里教导孩子。记得有一次我不乖,爸爸不责罚我,只是要我到爷爷的房间里跪在床边,把《万古磐石为我开》这首赞美诗背熟。到现在,四节赞美诗都牢记在我心里。

我被关在潍县集中营的时候,长辈们对我们这些孩子也很关怀,教导我们学习圣经、背诵圣经,要求我们把神的话牢记在心。当年学过的圣经,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被日本人强迫离开内地会在烟台的芝罘学校时,我们这些孩子唱着诗篇 146 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赞美耶和华”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我为什么讲这么长的开场白?因为本书译者尹道明的父亲和我

父亲是主内的挚友，他也是我童年时的玩伴。道明在父母悉心的教导下，从小就有一颗敬畏神、爱神的心，立定心志一生为主而活。道明爱神也爱国。虽然因信仰受到不公对待而经历相当坎坷，但他深知这是为主受苦，也甘心为主背负十字架。

他年轻的时候就对巴富羲的经历有极深的印象，以致影响他的人生价值观直至今日。因此当他在 2003 年从我这里再次得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萌发了把它译成中文，介绍给华人中爱主青年的愿望。

从道明的经历中，照样可以看到在童年受到的教育，是怎样影响我们一生的。我们作父母和作师长的人，应该清楚知道用言语教导子女与学生，带领孩子们从小敬畏神的重要性；更应知道作为父母、师长，自己身体力行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把“以身作则”这四个字，深深刻在心版上。孩子们从我们身上所看到的，应该远超过他们所听到的。耶稣说：“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约 13：15）。父母、师长就是主的见证，在家里、在学校中时刻以行为体现出基督的荣美来，是对孩子生命至关重要的喂养。

巴富羲以他的性命作为献给神的馨香祭品浇奠在祭坛上，正如马利亚为主打破玉瓶倾膏溢香。他短暂一生的最大价值就是遵从主的呼召，为满足主的心而倾倒自己的一切。希望这位来自苏格兰的年轻医生，他那为主舍命的心志不但激励道明与许多神的儿女，今天也激励我们，以巴富羲作为我们每个人为主而活的典范。

最后，我想到提摩太。提摩太能够成为主忠心的仆人，乃是由于他的外祖母和母亲为他奠定了爱主、信主的良好根基。保罗在信中特别为他作见证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提後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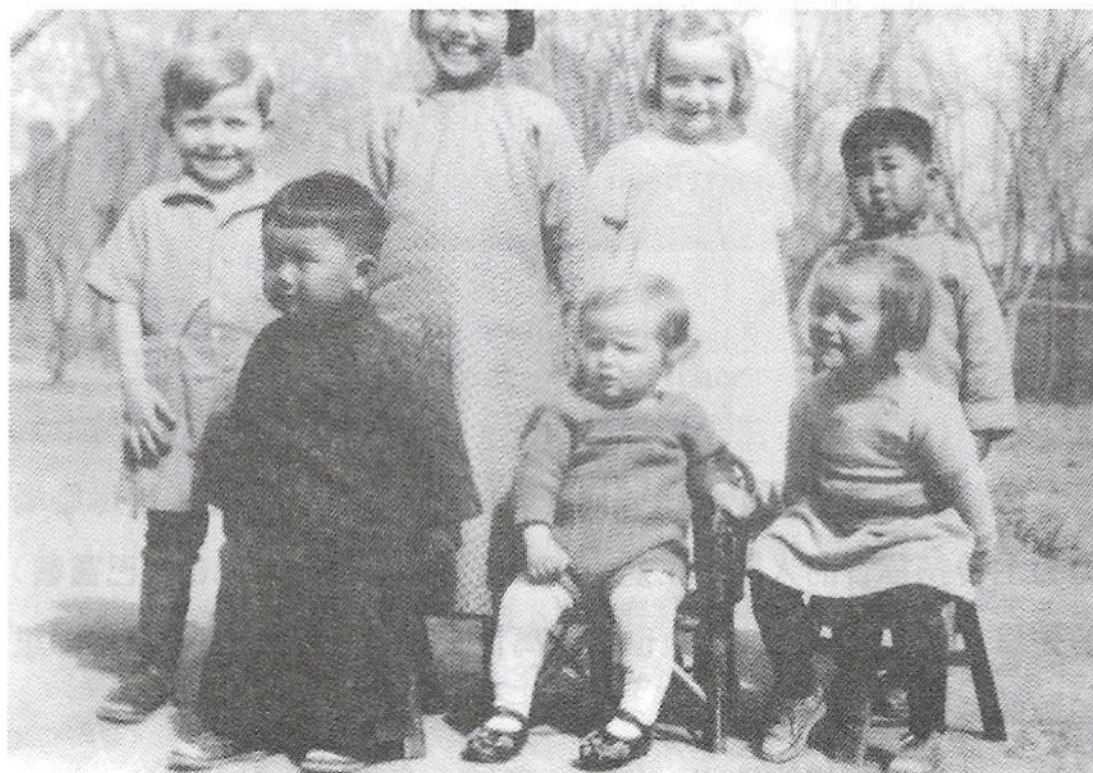
但愿这本书不但激励我们效法巴富羲爱主、跟从主，“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徒 15：26）；而且效法巴富羲的父母倾注毕生心血在子女身上，使孩子们个个成为基督精兵的榜样。

主不但呼召巴富羲，呼召他的父母献上自己的子女，今天主为照样要呼召我们和受我们教海的子女一同来侍奉祂。

戴紹曾

2009年2月17日

注：作者是“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曾孙，曾任“海外基督使团”总主任。



戴绍曾大哥（后左一）与译者（后右一）1936年在河南开封的合影

# 何竟如此

MARSHALL BROOMHALL 原著

尹道明

译述

“何竟如此枉费香膏呢？”

——马可福音 14 章 4 节

“To what purpose hath this waste of the ointment been made?”

——St. Mark 14:4

谨将这本简短的纪念册《何竟如此？》献给所有在中国尽心竭力为主传扬福音的人，并在爱中怀念爱弥尔·费西尔巴凯（巴富羲）的先母。本书脱稿之前，她也已经离世去见“万王之王”，在主那里与她的爱子重逢。

中国内地会设置机构地点：伦敦、费城、多伦多、墨尔本和上海  
代理商：宗教短文书刊协会（伦敦 Bouverie 街）——1933。



Dr. Emil Fischbacher

爱弥尔·费西尔巴凯医生

中文姓名：巴富羲

1903 年 8 月 9 日生于格拉斯哥

1931 年 12 月 31 日启程来华

1933 年 5 月 27 日死於新疆

## 序 言

有时我们内心会被意外的悲惨事件刺伤，爱弥尔·费西尔巴凯（巴富羲）医生来华仅十六个月便英年早逝。噩耗传来，脑海之中顿生“何竟如此？”的疑云，以及对他的深切怀念，于是写出这本小书——何竟如此？

人们或许会想，如此短暂的人生，能有多少可写的内容呢？我们的回答是：除去他的短暂人生本身的价值，还有一些与他有关的事件，既重要又激动人心，例如抵达上海时，日军轰炸的爆破声，成了一首蛮横无理的迎宾曲。穿越戈壁沙漠的诸多艰辛与危险，展示去新疆传扬福音的重重困难。在那遥远地方发生的叛逆与骚乱，凸显开荒布道形势的严峻……这些内容及更多的事件也都收进本书。

已故的尤金·斯多克博士（Dr. Eugen Stock）曾对一些寿短的传教士们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作过有益的褒扬：大卫·布兰纳德（David Brainerd）二十九岁辞世，在印第安人中传道尚不满三年；亨利·马丁（Henry Martyn）三十一岁辞世，仅从事了宣教工作六年；韩宁顿主教（Bishop Hannington）去非洲宣教仅三年，便在任职之前被杀害。以上列举的，只是诸多早逝人士中的三位而已。人的生命是不能用在世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其价值的，斯多克博士在论及大卫·布兰纳德时说：“他死后为他所著的传记，要比他生前的工作更有效”。瞬时所播下的种子，要经历几个季节的发芽和生长才有收获。谁会用主耶稣活在世上的时间，来衡量祂生命的价值呢？我们自己往往只了解历史的表象；唯有爱才能明白其中的奥秘。

如果本书能加深读者对到中国新疆——那片广袤遥远，爱弥尔·费西尔巴凯（巴富羲）为之献出生命的地方去传扬福音重要性的认识，将是出版此书的最大收获。

海恩波

Marshall Broomhall

1933. 10. 31

## 抵华时的中国时局

“我们刚收到英国发来的无线电报，得知中国已宣布对日本作战（按：指 1932 年日本侵沪的一·二八事变），我们已有 48 小时未能与上海联系上了，船长不知道能否在上海靠岸？船上的人都处在激动与不安之中。”

以上是爱弥尔·费西尔巴凯在汽轮 Naldera 号上给家乡一位“老友”信中的一段话。当时轮船已位于中国近海，离长江口仅 80 英里，却得不到任何中国宣战和交战的消息。

此后不久，他又在另一封信中写道：“领航员在三四个小时之前，曾出现在甲板上，显然他也不知如何是好，看来我们肯定要在船上待到天亮了。我们已有三天无法与上海联系，船上获得的一切消息，都来自英国，显然上海的中国官方电台已被摧毁。船上的负责官员不愿意在没有靠岸，装上预定要运往日本的货物之前，便直接驶向日本。今晨 7 时，一艘大型英军巡洋舰 Suffolk 号，以每小时 30 海里的速度，超越我们乘坐的轮船，朝上海方向急驰而去。当我们启程时，它尚停泊在香港，平时在此海域每小时的航速仅为 13-14 海里，如今 Suffolk 的航速加倍，显然有紧急任务。”

写信的人爱弥尔·费西尔巴凯是船上一个年轻的六人小组中的成员，这六位都是到中国来投入传扬大喜福音的新志愿者。其中三人（包括费西尔巴凯在内）是学医的。他们是中国内地会发起的“二百人”招募运动中，最后的一批应召者。在 1931 年最后一天，他们的轮船离开伦敦启航。时值圣诞节假期及新年来临之际，众多属灵的团体特地为他们安排了一段陆地旅行，再到法国马赛港去重登原来所乘之船。

船上的旅客长时间滞留在吴淞海军要塞外面数十海里的海面上，心中都很焦虑，轮船不能正常在码头靠岸，旅客便只能乘坐小型的勤务船登岸。在 Rowe 夫妇的迎护下，小组六名成员都安全抵达设在内地会新址的接待站。而迁出仅七个月的总部旧址，目前正处

于中日交战地带，并已被日军占领。神让几位初来者在抵华伊始便经历这惊险的一幕，实有祂的美意，要他们对今后为神作工的艰辛，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爱弥尔·费西尔巴凯来华后的中文名字为巴富羲，在以后的译文中便采用此名。——译者

日本的侵略行径，对初次踏上这片陌生土地的客人们，确是一次蛮横失礼的迎接。不过这个吸引他们前来传扬福音的大国，此时的局势尚未完全失控。街边绵延数英里的商店，全都闭市，邮政总局，中国人的银行及海关也都歇业。对那段动荡的岁月，在几经周折才寄回英国的信函中，青年巴富羲有不少生动的叙述，抄录一二如下：

“今天时局才稍有好转，此前一直相当严峻。每天一早，我们便处在中日双方持续交火的环境中，不停的枪声和爆炸声，整天都在震撼着我们。今天晚报上报导，黄浦江上的日军炮艇，已将吴淞口的中方要塞完全击毁。”

“我刚去楼顶上察看过，远处的景象令人不安，一片长达三英里的街区大火熊熊，天空被火光映得通明。现在闸北区已没有剩下什么了，这是一场殃及无辜的惨祸，从战区涌出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在一切能派上用场的船舶中，都塞满了逃难的中国人。我们真要向神感恩，如果此时内地会的总部仍在旧址，一个月前就得撤走了。而目前我们待在总部的新址，却是相对安全的 [注]。新闻路上也曾遭到过两发炮弹的轰击，爆炸地点离内地会总部的新址，仅咫尺之遥。”

巴富羲虽已到达上海，但他还要再离开上海，溯长江而上，去安徽省安庆市的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不过在继续讲述他在中国短暂而感人的生涯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为什么他会在英国作出决定，去中国面对传教士命运中的试炼与责任。

[注]原建于虹口区的上海内地会总部，占地仅有7亩，因不敷需用，1930年全部出售，用售房之款购得沪西新闻路1531号空地

22亩，建造大楼二幢，小楼一幢，经一年施工建成，于1932年初，中日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前数周，完成了全部迁移工作。位于虹口区的旧房则在战争中受损，神的恩典何等奇妙。

## 原本可以在英国行医

当马利亚将至贵的香膏浇在主的头上，抹在主的脚上时，一些不明含义且很不喜悦此事的人们议论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卖三十多两银子。”如果我们的心眼被蒙蔽，也会作出类似的错误抉择。对青年人来说，更是如此，现实的花花世界，是青年自我体现人生价值的舞台，每天为世上暂时的纷繁事务劳碌奔波，从他们身上时时透射出形形色色有蛊惑性的魔力；内心的诱惑，外界的争斗，常使一些年轻的信徒，看重今生的得失，而不愿破碎自己生命的小杯，将宝贵的才华，倾注在主的身上。年轻的巴富羲，在来华之前，这个世界同样也为他提供过诱人的发展机遇。

巴富羲的父母都信主，在十个子女中，他排行老六，是第四个男孩，家庭和双亲对他的影响很大。家中众位长成的兄弟姐妹，均在早年归向基督，并全部由 John MacBeath 牧师为他们施洗。巴富羲在童年时代，也曾向讲台上的牧师递交过一张亲手签名的发愿卡，上面写着：我年轻，健壮又自在，尽力作我能作的事；为了真理，公义和祢，——生命的主，我来就祢。

国外布道的事工，一直是巴富羲一家首先关注的事。他父亲有个宏伟的心愿：希望他的儿女之中，至少有五位能成为在经济上不依靠其他社团资助的国外传教士。为实现此心愿，他辛勤工作，使亲手创建的企业兴旺发达。他特别关心在中国传扬福音的事工，因为中国内地会一直在他心中处于备受关怀的地位。巴富羲成年时，他的大姐已在中国传道，但他并不重视中国，在他考虑可能去布道的地区中，中国名列末位。或许这倒是件好事，使日后去中国的抉

择，完全出自本人而非他人，甚至在潜意识上，都未受外界影响。

下面我们摘录几段巴富羲于1933年2月15日在中国新疆首府写给弟弟的信件，从中可以部分了解他心中与神相交的光景。

“我在1926年取得医师资格之后，一直以为神呼召我的时刻即将到来，当时我并无去国外为主作工的强烈愿望，中国就更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你知道W医生有三四年一直希望我去他那里工作，起首三年的年薪为1200英镑（相当现在12000英镑，约合12万人民币），以后年薪增至3000英镑（约合人民币30万元）。这样的收入难道还不足以维持生计吗？然而我始终觉得那不是我该去就业的地方，因为心中总感到有去国外传道的可能。W医生虽然知道我的想法，却无法理解，为什么放着报酬丰厚而且稳定的工作不就，反倒情愿东奔西走，甚至到处碰壁去谋求多种不稳定的工作呢？先是普通实习，而以后到过外科医院，热带病科，动大手术的外科，公共卫生和防治结核病科，耳鼻喉科，另外一次普通实习，眼科等等，它们是多么的纷杂啊！如今我在这里（指新疆），也像个普通的杂役，要应付许多事，我非常看重往日那些不同的经历，其意义远远超过我现在所能述说的。”

以上摘录的段落，是他与弟弟通信中的内心表白，作者本无意将其公之于众；然而这些文字确实能将我们带入他的内心世界，了解一些外面世界对他的诱惑和曾向他提供得荣耀的机会。他也遇见过撒但试图要他推卸责任的试探，因为他一度想过，能否用自己在国内工作的财力，资助两三位神的工人，替代他出国传道，或许这样做比他自己前往的效果更好。“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可14：5）。”然而神乃是要他亲自而非请别人，在神为他所定的位置上作神的工。

就在这节骨眼上，神借着偶然拿到的一本1931年6月出版的中国内地会会刊“China's Millions”（亿万华民）指引了他当走的路。刊中有篇文章是一位匿名的中国传教士所写，呼吁青年信

徒来华为主作工，文章开头便提到内地会发起的“二百人”来华运动，接着便问道：“这呼吁对你意味着什么？或许你曾持有不同的意见；然而你是否想过，这些不同意见，在将来见主的那天能站得住脚吗？”

这几句话仿佛是一位传教士从千里之外射回本国的利箭，深深地触动了巴富羲的心，当时我们（指作者）正在苏格兰他的家中度假，每天打打高尔夫球，过着悠闲的生活。他看完匿名作者的呼吁之后，立即写信申请加入“二百人”的行列，因不知该向谁提出申请，便将信寄给刊物的出版人。信中写道：“过去我一直向往去非洲传道，坦白地说，我从未考虑去中国，甚至也从未觉得有可能去中国。但上周六的晚上，当我拿起本期“亿万华民”，并读完那篇呼吁青年到中国去的文章之后，便再也无法抗拒圣灵的感动，不得不提笔写这封申请的信。”

这是1931年6月份的事，正值内地会准备在斯梅西克（Swanwick）召开大会的前夕，申请信很快转给内地会在英国本部的负责人W.H.Aldis牧师[他是日后曾长期在圣光中学服务的内地会传教士姚如云（Gorden Aldis）牧师之父——译者注]，巴富羲在给他小妹妹的信中，讲述了以后的联系经过。

“我收到Aldis先生的短信，问我能否得空去斯梅西克，参加内地会召开的大会，并与他会面。昨天我有半天休假（当时他在曼彻斯特附近实习），便赶了61英里到斯梅西克，参加三场美好的聚会，并在晚上九点一刻，如约与Aldis先生见面。我们先外出散步，然后返回他的室中一同祷告。现在我感到奇怪——真不明白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如果你在这里，我会当面向你详述。此前我的内心曾月复一月地感到压抑，似乎已完全迷失方向，而如今神已成就了他的美意。

他妹妹将此信转给别的兄弟传阅，但并未告诉父母，因为巴富羲希望有一天，当他回家时，能向他们面谈一切。

从此以后，他书信中的基调完全变了，荒漠涌出溪流，满溢的



喜乐取代了内心的压抑。透过他的私人信件，可一窥神赐他的“有夫之妇”之地（Beulah land 参看以赛亚书 62 章 4 节）。以下是他写给同一位妹妹的信：

“在斯梅西克的日子虽然极其美好，但我仍觉得尚未站到最蒙神赐福的地位上，因我总想保留一点自己的权利，所以内心未享完全的安息。当我进到内室，用半小时与神交通之后，里面那一点不愿顺服的心态消失了，我不希望它再回来，因为神给了我百倍的报偿，多么奇妙！我如今渴望到中国去了，而此前却一直不愿考虑是否会去中国……。”

“最近这十天半个月里，心中一直萦绕着圣灵充满的问题，我曾用了很多时间为此事祷告，深信神有更多要赐给我的，因为祂满有恩慈。昨天晚上，我感到这个问题成为灵程上的巨大障碍，如不解决难以前行，我一向不愿效法某些求神施行奇事并以此来试试神的人，但昨晚神启示我，要我试试祂。作完睡前的晚祷，确信神将亲自为我施行奇事，祂必垂听我的祷告，心中平静安宁——你恐怕难以体会这一求告对我的重要性。当我正准备熄灯时，忽然注意到那本名为 Daily Light（每日之光）的书，便打开阅读了当日的信息，文中开头的一段内容，完全满足了我的需要。我们有位何等奇妙的神，然而有如此认识的人，又是何等的少！

我想你记得，被圣灵充满曾经是我多年的求索，但我未专门为此事祷告。多年之前我读过慕安德烈（Andrew Murray）著的《真葡萄树》（The True Vine），我需要书中讲述的那种感动。读后头天晚上，在神面前等候了大半夜，接着第二夜，第三夜，在四天后便放弃了。如今才明白，如果当时抱着雅各在渡口与神摔跤时的态度：‘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神必早就使我被圣灵充满，救我脱离这些年间的退后和愁烦了。”

在巴富羲给他弟妹的信中，尚有不少值得摘录的片段，然而上述内容足以表明，他灵程中的天光已经破晓。他也曾怀着极大的惊喜向他的病人们谈论圣灵的事，心中难抑的大喜乐，无法言表。

有些写给病人的信，业已公之于众，在信中他用完全释放的心灵唱道：

现在我明白，顺服就是喜乐，  
再无苦恼，也无内心和思想上的争斗，  
我的心已经完全与神谐和。

他深谙诗篇 48 篇 8 节的含义：“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他松开了保全自己的锚链，毫无阻拦地漂浮在神福祉的大海之中。

如第一章所记，作为最后一批“二百人”招募运动的志愿者，巴富羲在 1931 年的最后一天（除夕日），告别故土前往中国，在轮船到达上海时，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暴力迎接。现在我们要接着第一章的开场白，继续叙述日本人轰炸上海闸北区的残暴行径。

## 学习中文的学校

新来的传教士，一般在到达中国之后，便会毫不耽延地前往学习中文的男校或女校；然而由于日本挑起的战事，巴富羲和他的六人团队在抵达上海之后，却难以及时离开。所幸在上海滞留不到两周；而另外有些传教士便没有这样幸运了。

巴富羲在战争状态下的上海待上十天之后，给家中写了如下的信：

“我已逐渐习惯了这里的战争局势，只是夜间还会受到一些震撼。恐怖的爆炸有时似乎就发生在窗外，差不多将人从床上震下来，剧烈的响声也折磨着人们的神经，真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总爱在夜间大举进攻。”

作为一名医生，他很快便有了用武之地。中国的医院里满是伤兵，但本国医生有限。巴富羲除了救治来到他这里的伤员，有时候还要去参加别处病号的会诊。为了尽早离开上海，还要走访政府各

相关部门的主管。在一封写给“亲爱的自己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告诉你，他们（指中国政府的官员）虽是一班达官贵人，却不能给我们有效的帮助。没有到过新建的内地会上海总部，就很难想像它的建筑规模有多宏大”。

有些“达官贵人”的确在尽其所能帮助这些年轻的“渔夫”及早离沪去语言学校，但这并不容易。最后他们总算订上船票，并将行李（包括手提的）都送上了甲板，因船要到次日中午才启航，所以他们决定当晚仍住在传教士的宿舍中。第二天经过两三个小时的好言劝说，出租车司机才勉强同意驾车送这六位青年人去位于日军控制区内的轮船码头。然而到达江边一看，天哪！预定的那艘船已经载着他们的行李开走了。原来当天战事意外的平静，船长认为此乃启航的良机，便不管旅客是否到齐，匆匆启锚开船。临时受挫的行程，也带来一些趣闻，这几个青年人在找回行李之前一无所有，不得不为剃须刀或睡衣等日用品东借西挪，好不尴尬！

五天之后，再次上路，为避免重蹈覆辙，决定上船去过夜。但这一次无论是美言还是厚利都无法说服出租车的司机送他们进入日本占领区。迫不得已，只好租条汽艇沿黄浦江下行，到达登船之处。巴富羲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入夜之后如果在街上徘徊，就会产生阴森恐怖之感，上海每晚都实施宵禁，10时以后，任何人都不得外出。我们战战兢兢地在一二十名日本，美国和英国军人面前通过，来到码头的登船之处。一艘日本海军上将的旗舰离我们乘坐的船，仅有数码之遥，然而一切平安。我们在船侧登船，启航之后，允许上甲板活动。船上混乱的景像令人瞠目结舌，我们被挤散了，各自在密集的人群中艰难地穿行，到处都是急于逃离上海的难民，随身仅带着少量残留的财物。我们乘坐的船，是航行在近海或江中的小型客轮，有二十号头等舱，二十五号二等舱和将近三百号三等舱。但如今却挤上了八百五十名带着行李的难民。我们朝预定的二等舱位前行时，周边的气氛十分紧张，啊！如今回想起来，还有些后怕

呢，然而不管怎样，我们总算在船上了。”

“次日上午轮船启程，依次从四五十艘军舰前面经过，这些军舰，包括鱼雷艇、驱逐舰、巡洋舰、战舰等等，大部分是日本的军舰，也有少数象征英国的英舰。为防止被流弹误伤，我们的船在甲板上包裹了厚厚的铁板。战区岸上的景象十分骇人。半个月前曾见到有些村庄的地方，如今全部夷为废墟，江面上充斥着来自废墟的残板碎片，废墟中已见不到任何生灵。”

凄惨的景象，使这几位新参加“前进运动”（指二百人来华运动）的成员，及一切已经在华为神作工的人，都能深刻体会旧约时代的先知尼希米，在那个动乱不安的时代，重修耶路撒冷城墙时的悲感心情。已经在异国为神作工的志愿者，仿佛在告诫新来的年轻成员：

假如你选择和我们休戚与共，  
就该每天顺从神的差遣，  
并准备有时会经历崎岖之路。

但在警句之后，要加上确信之勉：  
不分此处或彼处，神永远是我们的父，  
有时虽然在旷野，祂与我们更接近。

从长江口逆江上行400英里，便到了内地会语言学校的所在地——安徽省安庆市。该校是1887年戴德生征召“百名新同工”计划实现时建立的。随着征召工作的持续推进，学校经常超负荷地承担着培训任务。巴富羲来校时有学员68人，他将在此学习两个月的中文，这与他今后布道的岁月相比，只是一段短暂的时光。

巴富羲在乘船的途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数月之前（指1931年夏季）长江特大洪水对两岸造成的严重灾情。到达安庆的江边，连一个像样的码头都没有，所以登岸相当费力，城内狭街窄巷遍布，现在让我们听听巴富羲对培训之家的叙述吧。

“我如今所在的地方是个二合一的机构，希望有一天能绘图向

你展示，它既是一处宣教站，也是一所语言培训之家，此地的教会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权。谢柏森（Martin Shepherd）先生每天大部分时间和我们在一起，培训之家只有他和 Hayward 两位是全职教师。在这二合一的机构里，有 72 位外国人，其中 68 位学习中文：7 位德国人，1 位瑞士人，2 位瑞典人，2 位来自新西兰，8 位来自澳大利亚，有些人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和加拿大草原地带的卡加立城，4 位苏格兰人，其余是英格兰人。这里所有的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整体，如果人们来此亲眼目睹，就会理解中国内地会发起‘前进运动’的意义，它是一个将各国来华的传教士融为一体，同心兴旺福音的伟大运动。”

巴富羲的父亲始终有一个愿望，便是去国外宣教的儿女能不靠差会资助。这种想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巴富羲并不十分认同，他和内地会众弟兄们都持有更高一筹的见地。

在此先向读者介绍一下中国内地会特有的供给方式，是创始人戴德生近四十年前，经过慎重考虑所制定的。如果要赞成或反对的意见加以评述，恐怕会写出一篇冗长的文章。简而言之，这种特有的供给方式，就是将教会中众多变化不定的需要，统统纳入一条单凭信心生活的不变路线中去，教会的经常费（General Funds）用于为传教士开设的子弟学校及医疗机构，传教士的福利，往返上海总部及内地各地的旅费，行政管理费用及各地房产维修等方面，每位传教士的个人开支不过是总开支的一部分而已。戴德生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如果有某教会或个人想要资助某位传教士，除了对个别传教士的家属资助以外，最好不要直接交给本人，而是通过经常费统一发放，内地会认为无权同意巴富羲家庭提出的这种例外的支援办法。

巴富羲毫无保留地接受内地会的信心原则，他无意在生活费用的供应方式上，与别的同工弟兄有所不同，他迟迟未向父亲表态接受他的建议，直到父亲来信重申这是既自然又适合于他的惟一供应方式，因为这将使全家的人都成为他在经济上和代祷中的伴侣时，

巴富羲才在信中回应此事。他写道：“非常感谢您答应作我经济上和代祷中的伴侣，真遗憾以前我在家中时，没能让您及时知道某些事情……。我迟迟未就您提供经济资助的事表态，是因为我心里尚不完全清楚在经济上究竟选择何种供应的方式更有利于福音工作的开展，是完全不靠差会，直接由您提供呢？还是通过差会间接的得到您的支持？其实在主看来，两种方法并无差别……。我觉得作一名经济上独立的传道人，有不少好处；但作为差会中的一名全职人员，与大家毫无二致，恐怕对我更为合适。就自己的志趣而言，我自然愿意作一个独立自主的人，那将会有一种优越感，以往我也一直认为理当如此。不过现在我加入了一个凭信心生活的布道团体，觉得没有资格在供应问题上再保留任何个人的观点，我的确认为对此事作出决定需要祷告。我在信中对目前自己所处地位的叙述虽不完整，但仍然相信能使您理解，我选择接受何种经济资助的方式，不涉及是否有厚此薄彼的考量，那完全是我与神之间的事……”。

“您说您一直渴望有位代祷中的同伴支持您的事业，我固然不清楚每天您在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具体困难；但我认为自己有成为您代祷同伴的特权。为您的企业代祷将成为我每天必做的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求神祝福您的事业，给您天天所需的恩惠和力量。”

在父子之间就经济供应方式进行探讨商榷之际，巴富羲也像戴德生那样，经历了一段信心蒙受试验的日子。中国内地会以为他父亲负责他的经济需求；而他父亲则以为内地会在照应他的需要。上海内地会总部的会计的确不止一次与他联系过财力支持的事；但均因其父未明确发话而暂缓接受，以致一度在经济上颇感困窘，不过这倒也为他提供了一次单独与神直接交通的特殊机会。当时他的处境既有趣又严峻，全部经过绝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在给妹妹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你能理解我目前的处境吗？有时连我自己也觉得好笑……，顺便提请在别的亲人面前，要对我的现状绝对保密。或许他们认为我给他们的信尚耽搁在邮寄的途中，我不想欺瞒他们，只是不想

让他们得知我现在的真实情况。千万不要以为我沮丧了消沉了，恰好相反，我正处在最佳状态，如今在中国的处境，恐怕会成为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事。我要为主领我所走的道路，向祂献上衷心的感谢和赞美。这条道路不是我凭天性的自然选择，然而却是一条多么蒙福的路径啊！这是一段寻见神并证明神是信实的经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神所指引我的当行之路”。

披露他这段私人生活的意义，在于这些文字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尽心尽意毫无保留奉献自己的一生和一切给神的人。

巴富羲到安庆语言学校不满六周，内地会总主任何斯德先生（Mr. Hoste）在柳庆春（A. B. Lewis）先生的陪同下，也从上海来到该校，要给每位新来的学员确定工作范围，让大家早点动身，以免夏季高温时上路的困顿。当时虽然才是三月早春，但分配工作不能再延宕了，他们需要分别会见六十多人，和他们逐一讨论未来的工作，并最后作出决定。对内地会的行政人员而言，这是件非常艰辛的任务；对每位学员而言，则是他们极度关注的大事。

何斯德先生来安庆之前，巴富羲在一封家信中便写道：“我预感不久，将有一生中最令我惊奇的事来临，但现在还不清楚这究竟会是什么”？原先在上海时，巴富羲和何斯德两人在餐桌上的座位就互相毗鄰，他在信中说：“我常在就餐时挨着他坐”。可能当时他便察觉何斯德已经开始在考虑他的未来，所以当何斯德到安庆之后，在等待个别谈话期间，他才会有所悬疑，他知道既然有起首的召见者，也就必有最后的召见者，而他正是被最后召见的第六十八位。准备就餐的铃声已经响过，而何斯德和他之间的谈话尚未完全结束，当时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向家人介绍自己将去的地方——新疆，因他对该地知之甚少。当时对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是明确的：第一，新疆离他姐姐作工的华北地区有两千英里之遥，第二，数年之内，内地会不可能在那片遥远的地方兴建医院。

在给家中的信中他写道：“以前总希望最好能到一所已经建成并且诸事有序的医院中去，和一班有责任心有资历的同事一道工作；

但这不是我的事，乃是神的事，神会为事奉祂的工人定夺”。

如今他乐意接受一切临到他的事。“我的小小权利”在英国参加斯梅西克大会期间已经消逝，对神他只有无言的顺服，而对他们这个即将奔赴新疆的团队，却描述得很发噱。他写道“目前赴新疆的团队已经有了五人：两名澳大利亚人（其中一人来自澳洲南部的塔斯曼尼亚岛，另一人出生在中国），两名英国人（其中一人在新加坡长大，另一人是地道的英格兰人），和一名原籍德国的美国人，他有两年时间和我的小弟巴辅胜（Theo）同时在美国慕迪圣经学校就读，如今我这名苏格兰人再加入其中，将使团队的多民族色彩更加绚丽”。

刚好一周之后，巴富羲收到了上海内地会总部寄来的航空邮件，告知派他去新疆的决定已正式批准，并要他火速去上海，与从山西来看他的姐姐见面。以后姐弟两地将隔着半个亚洲，重逢的时刻将如空间的距离那样遥远。见信之后，他迅即回应，将闹钟调至次日清晨四时，起身返沪，经过一段他称之为“漫长又拥挤”的旅途之后，再次来到上海。

## 学习忍耐的学校

总部发出航空邮件将巴富羲紧急召回上海，是想让他在长途跋涉去亚洲腹地之前，能和姐姐见上一面，今后姐弟相隔近两千英里，真不知道要再等上几年才能重逢。然而中国真是一所学习忍耐的太学校，对性情急躁的人特有益处，他们想不到，竟然要等待近四个月，才能如愿上路。

在往下讲述他和同伴的崎岖之旅以前，先让我们从他姐姐（巴若兰教士）——一位传道人的半公开信中，看看她对这位已数年不见的弟弟有何印象。以下是她信中的话：“我将见到一位大有改变的弟弟，见面之前我真不知道有多少变化是志趣和能力方面的，又有

多少变化是属灵经历方面的。然而从码头到总部的短短车途中，他的表现已经使我满心喜悦，随着与他的更多接触，欣喜的心情也在增加和深入，像我这样自认颇有自制力和务实性格的人，也几乎无法控制情绪，我必须反复晃动自己，以证实这不是在作美梦。如今在我身边的人，的的确确就是从前在家时常小心翼翼地躲着我的小弟弟”。

“在上海相聚的日子里，能真实地观察他的长进，乃是我亲眼所见的诸事中，最美好的一件。蒙神大爱的吸引，他能领悟灵界的奇妙，在灵程上迈着有力的步伐快速前进。我们已分别数年，有许多的人和事可供谈论；但在上海同处的整整三周之中，彼此都感到有太多的主恩应该告诉对方，以致少有闲暇去论及别事”。

“相见伊始，我们便达成共识，相互的交往不应妨碍各人与神的交通，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属于神的。当我看到弟弟认真恪守与神交通的时间，真是高兴。有一次我俩应邀晚间去参加一处基督徒的小型聚会，原本希望在聚会中有机会作见证，但事与愿违，那晚似乎是虚度了。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返回，一同晚祷后在相互道别时，我以大姐的口吻告诫他，要尽快上床休息，他看着我，听我讲完，然后说：‘我还不能上床休息’”。

“他从上海发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写得很匆促，只有短短数行，要我为他初识的两位朋友代祷，一位是某药房的助理，第二位是另一家药房的俄籍药剂师，都是在购货时认识的。与这位俄籍人士只单独接触过一次，以后每次在店中相见时，均有旁人在侧而没有机会继续深谈，他利用购物和付账的机会，向人传扬天国的福音。

从两年前他将毕生奉献给神的那天起，神就一直在试验他是否有完全顺服的心，神不能向他要一切神想要的，神只能要他乐意奉献的。当我初来中国的时候，神对我只有赐给而没有索取；但我弟弟来华令我惊叹，神几乎已经得到了他的一切。我们在上海见面的头一天，一同跪下祷告的时候（那天也是我头一次听见他开口祷告的日子），他满心感谢神恩慈的带领，他说的话至今难忘：‘主啊！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有大能的作为’”。

“我弟弟心中对神十分渴慕，神的爱征服了他，他定意要走那条能深入认识神的惟一道路——接受神试验的路。不像我这位大姐，他是个有激情爱交际的人，为此及另外的原因，虽然第一次向他谈及新疆时，他曾有退缩之念，然而新疆会使一些人战栗，却不会使他战栗，除非他害怕继续顺服神的旨意。当他清楚到新疆去是上面的呼召以后，他写道：‘这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接受差遣去新疆的唯一理由——因这是他所爱的神的旨意，他乐意应承他的呼召”。

去新疆要如何走？是当时面临的大难题，有三条可供选择的路线：第一条经过甘肃——中国西北的一个大省进入新疆，走这条路虽然较慢但较安全，但此刻因有战事而暂被封锁。第二条则需要穿越印度北部绵延起伏的山岭，不仅沿途非常危险，而且每年可以通车的季节也短。第三条绕行西伯利亚，全程路途虽然较长，但其中大部分旅途可乘坐火车，比较方便。根据当时的情况，选择了第三条路线。早在四月份便向苏俄当局提交了过境申请并请求签证，但由于莫斯科方面一些未知的因素，申请迟迟得不到批准。最后令人失望的原因终于清晰了，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官员们，不愿协助任何与宗教有关的工作，这扇门已关闭了，接下去又该怎么办呢？

到新疆去的“前进运动”是经过多方面祷告和思考才定下来的，不应坐等神的开门。一位在中国有坐飞机和汽车旅行经历的G·Findlay Andrew先生早在四月份便私下对巴富羲医生说过：“为何不经内蒙去新疆呢”？但在某些人看来，这无异是去沙漠找死，以前确曾有远征者走过此路，不过那都是规模较大并经过精心组织的探险队。以Citroen的横穿亚洲探险队为例，队中有九名精选的技师和七辆牵引的汽车。瑞典人斯文哈定博士（Dr. Sven Hedin）曾穿越戈壁，但他的探险队也同样装备精良，并且由五种不同国籍的科学家组成。巴富羲他们的团队，不仅现在不具备那样的规模，而且也不敢设想能达到那样的规模，但如果没有同样的精心准备，风

险就太大了，很不妥当，越了解沙漠的人，就越能明白其中的危险。

巴富羲虽对由内蒙去新疆之路一无所知，但当时他已具备不少与汽车有关的知识与技能，当他听到 Andrew 先生的建议后，便开始私下进行咨询和制定旅行计划，他将自己设计的货运汽车绘成草图寄去给家人看。我们面前有一封他在 6 月 14 日所写的信函，信中记录了许多他思考所得的结果。例如汽车的耗油量，携带汽油的重量，必要的行李，他中意的车型及必备的零件：推进器杆、车的后轴、差速齿轮、活塞、连接杆，活塞圈膜瓣、带帽的螺丝钉、螺帽；以及板、铲、镐、链、绳等等。他说他们团队中有三位会开车，除他以外，还有一位工程师和一位木匠。接着在信中对最小的弟弟说：“你是否认为我们心浮气躁，办事不够执着，其实大家心中都很焦急，企盼尽早抵达新疆，行期一再耽延至少在提醒我们，既然原先拟定的路线都不可取，就得另谋出路了。取道内蒙固然也有风险，但与其他方案相比，困难恐怕还是最小的”。

长话短说，取道内蒙赴新疆的计划，终于落实了，巴富羲凭他在汽车方面具备的知识与技术，而被授权负责采购所需的汽车和设备，冒险往往是传教士经历中最独特的部分。内地会的新成员，一般由有经验的传教士护送至目的地，此次的领队，是来华已四十多年的胡进洁（George Hunter）先生，他是全队中惟一懂得那一带方言的人，在亚洲的腹地——中国西北边陲待了长达一代人的时光，有二十五年未到过中国沿海地区。而队中其余的西方人，却对亚洲的腹地一无所知，也不清楚在那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巴富羲医生考虑团队在沙漠中长期乘坐汽车会影响健康，特地买了只足球，供大家途中锻炼身体。用中国人固有的安土重迁的眼光来看，这种旅程着实令人震惊。讲述此事为要说明在推进福音的历险中，既要凭信心，也会有恩惠。西方传教士飘洋过海来到东方的献身精神，超出人之常情。在一家人中，老年与青年两代之间，往往还会有理念上的碰撞，何况东方世界的人和西方世界的人，经历多个世纪的远隔，他们之间在各方面更会有何等巨大的差异呢？

巴富羲于 8 月 16 日寄出了到达北京后的头一封家信，行期已最后敲定令他欣喜不已，我们要援引一两封他的私人信件，而非他写给公众传阅的信件，来看看当时他对即将穿越戈壁远赴新疆首府的心迹。从上海寄回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已打破内地会新同工在上海总部逗留时间最长的记录，想想看来到中国只不过六个多月，却在上海待了近四个月，现在甚至闭着眼睛都可以在上海漫游了”。

在行前逗留期间他俨然成了一位深谙旅程的营运经理，当时中国社会纷乱不安，对旅途深思熟虑是必要的。他写道：“三周之前一位 Simpson 先生遭射杀，和我们有联系的传教士 Torvall 先生和他的三个伙伴也被杀害，新疆目前的治安情况混乱，并且霍乱流行，刚才获悉另有三位与我们有联系的传教士病故。”

对于新疆近期不可能开办医院的看法，他在一封给学医姐妹的家信中这样写的：“我并不想办一家医院，因我已完全改变了过去的想法，如今我真正关切的，只有人的灵魂。不要以为我的精神出了问题，我没有任何反常，只是稍微明白了人们灵魂的需要，及那条领人归主的喜悦之路。我热爱医学，一直期望能再拿起手术刀；但我不愿医务工作独占我的时间，医术显然是一件有助于福音工作的利器，这也是神给我的技能，但不是神在我身上的终极目的，这些话除了向你和弟弟巴辅胜表白之外，未曾对别人说过。

医疗在宣教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一直是人们关注和议论的话题，既然神同时创造了人的身体和灵魂，治疗身体的意义就不仅限于使身体受益了。我们相信医科决不仅仅是‘一件利器’因为‘一件利器’的含义不能涵盖神大能的医治，也不能涵盖一位敬虔母亲为孩子肉身幸福而付出的爱心劳苦。母亲对孩子的爱举，不只是一种行动，而且是她心中情愿照顾婴儿身体的感情需要，是她生命的自然流露；但那些爱心的行为也的确可以成为一种向婴儿讲述神爱的手段。使神的爱在婴儿未识一字之前便进入了他的心扉。爱心不仅能够而且还要持续向最聋的耳和最刚硬的心说话。源于神的爱是永无止息的。”

巴富羲自己透露并记录下来的这些话，表明他能很好地应对单纯将行医当作宣教工作的试探，不让他的医生职业和责任支配自己的全部生活和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愿意医务工作“独占他的时间”。在一件需要同时关切人们身心两方面的工作中，常会有偏左偏右的情况发生，我们应记住，必须要在持续的行动中，随时注意纠偏，以保持对人们身心两方面的关注能够平衡，这一原则适用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只要不安于现状而锐意进取。

此后还不到一年，巴富羲便因超负荷的工作去治疗战争中负伤的官兵，献出了生命，用神赐给他的外科技技术，作了无与伦比的美事。我们无须知道那些伤员在巨大的痛苦中是否有心倾听别人的谈话，也无须知道紧急救治的环境许可他向伤员说多少话，但确信这位外科医生的手，已使痛苦的伤员领略了源自于神的爱心。在那艰辛与恐怖的几个月里，巴富羲一直在用他的善行而不是口才为他的主作见证。

现在我们回过来谈谈在沙漠中应如何防范因沙粒所造成的问题——这可不是件小事，巴富羲为此切切寻求神的指引。有个远征队在穿越戈壁时，汽车引擎内的活塞与汽缸全都坏了，因为沙粒侵入使活塞和汽缸的壁很快便被磨损，表明穿越戈壁沙漠的汽车必须要购买特殊的弹簧，特殊的空气和汽油的过滤器，幸好在这方面取得了有经验的顾问们的帮助。

“Findlay Andrew 先生（他写道）不久前的一天突然来到北京，我和他就旅途中的有关事项交谈了一两小时，虽然他未曾穿越过戈壁，但对旅行的经验丰富。Soderbom（一位烟台内地会子弟学校的老学童）。与 Findlay Andrew 和我三人曾在一家旅馆中共进午餐，他俩都有说不完的经验，对我极为有用。你或许知道 Findlay Andrew 曾驾过一辆福特牌的货运汽车到兰州，在途中三度将引擎完全拆卸。Soderbom[他曾与著名的探险家斯文哈定（Sven Hedin）一同穿越戈壁]说有一次他在横渡额济纳河的时候，汽车在泥淖中逐渐下陷，最后只见到挡风玻璃的顶部，因为河水不深，要拽出来也并不难，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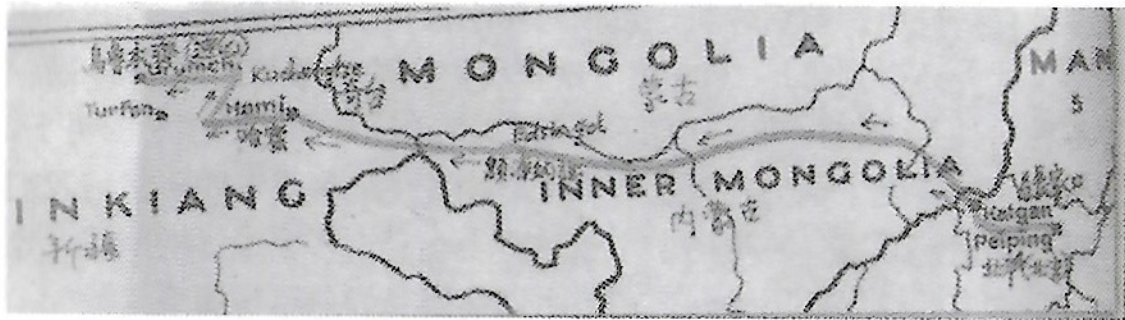
必须等待，要找到一二十峰骆驼，才有可能连车带人一同拉出泥潭，车上的引擎当然也就必须拆下来维修了。好吧！我们即将开始的旅行就像出去野餐一样，不是吗？我们都是年轻人并且彼此关系融洽。”

在向家人提示当时新疆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之后，便预告自己到了新疆，或许就不能自由地与他们通信，请务必勿因长久未收到信件而感惊异。

从这条路去新疆除了物质方面有许多困难，盗贼的出没也是个很大的危险。下面一段文字摘自美国地理杂志（American Geographic Magazine），记录了在巴富羲他们的宣教团队出发之前六个月的时候，Citreon 远征队在这条路上所遇见的事：

“午夜后不久（报告中这样叙述）我们已驶进内蒙古境内，便在乌拉山（Ula shan）附近一个小旅馆前面停车休息。次日见到一辆途经此地的道奇牌（Dodge）汽车，载着二十二名旅客，个个尘土满身，有如泥塑的人体模型，因路上遭匪徒袭击，有三人被害，其余的人也被洗劫一空，像是刚从‘临刑场’里逃出来一样”。

这样的事实虽然显示道路的危险；但因神大能的手保护着宣教团队，反倒使此路成了他们的蒙恩之路。



驾车赴新疆的行进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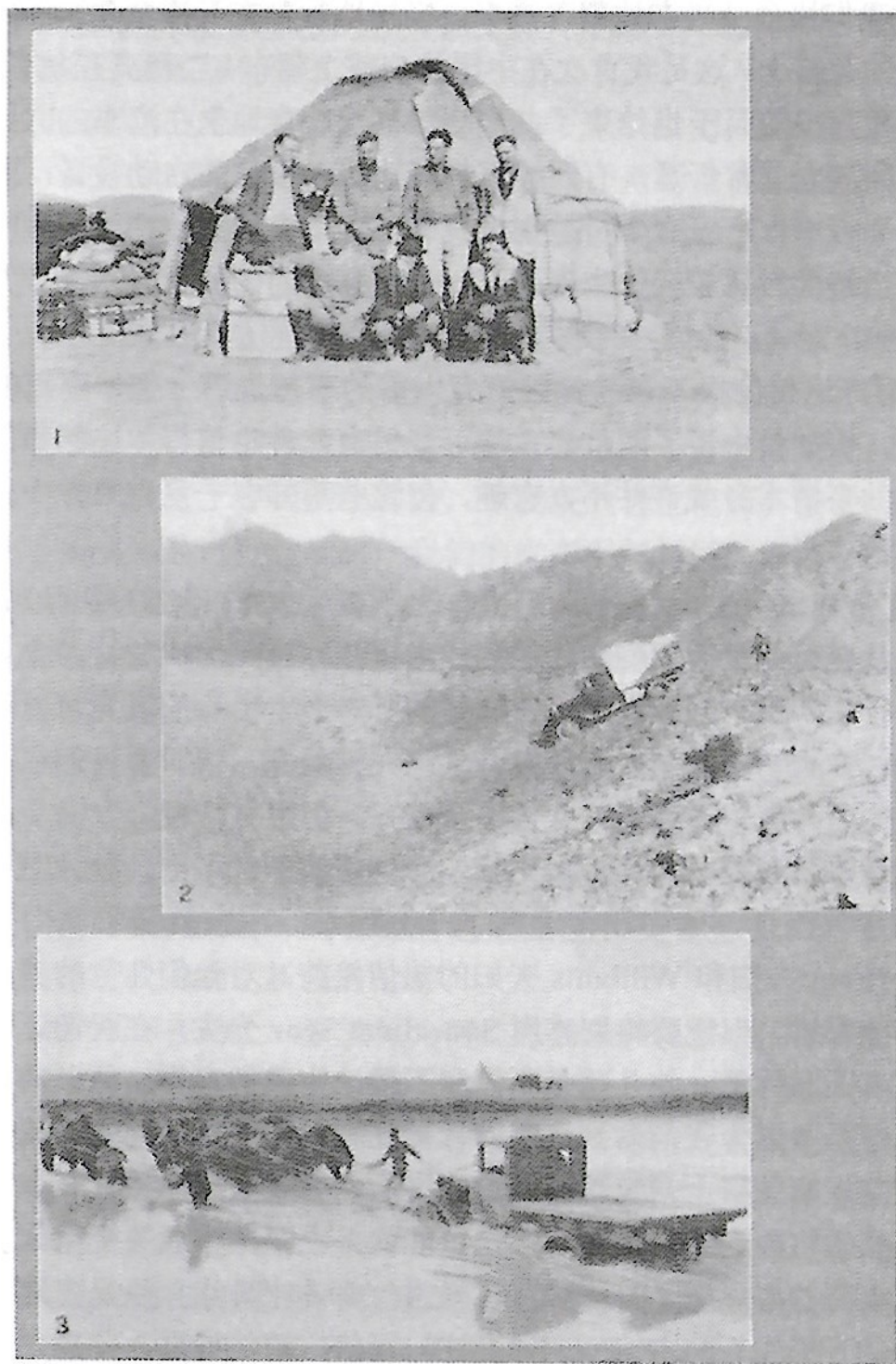
## 穿越戈壁沙漠

(本章的内容，全部摘自巴富羲自己所写的公开信)

8月15日应内地会总主任何斯德的请求，我和胡进洁先生同去北京，在北平（北京）和 Soderbom 先生商谈，对行程作出必要的安排，并采购穿越沙漠需用各种物品。需要安排的事项和拟购的物品都很多，我每想到一件要做的事，便立即记在笔记本上，不久所记的事便多到难以应付的地步，所以每逢有新的团队成员到来，便让他们分担些工作。石爱乐（Otto Schoerner）负责“军需处”，朱佩儒（Drew）管理“加热和照明部门”，何仁志（Holmes）是我们的总工程师，柏爱生（Parsons）掌管油（汽油）水（汽车引擎的冷却器），汽（轮胎）的供应：赵立德（Joyce）则是我们行装打包的负责人和首席“新闻发布官”。虽然这都是带些幽默情趣的“官衔”，但我想从中也可见我们彼此分工的默契，的确节省了我和胡进洁先生不少时间。

为旅途需用所采购的货品名目繁多，包括一顶能容纳七人的帐篷，捆扎和拖拽所需的绳索，鹤嘴锄，铁锹，铲子，用于沙漠的蒙古式燃火设备，羊皮睡袋等等……。我们还购置了许多备用的汽车零部件：轮胎，前后弹簧，后轴杠和小齿轮，各种轴承，各式小电器，此外还必须带足 2000 英里旅程所需汽油，重量达到 4000 磅；各种零件及食物并其他设备，总重 1000 磅；外加八名粗壮的男丁，其中六位带上了他们在世上的所有财物。由此便不难明白为何我们要选购两部载重一吨半的卡车了。路上会有许多要越过的障碍，也会有许多要克服的困难，但相信主必赐给我们恩惠与智慧。

两部汽车是在中国组装的美国汽车，汽车底盘要从上海用船运到天津，驾驶仓和车身先在天津组装。再与运来的底盘结合，然后调试引擎并装配上大量的附件。订购第 14 天，我和何仁志从北京去天津接收汽车，产品是杰出的，显出这家美中合营公司的良好信誉。



上：旅行团队全体成员在蒙古包前合影，后排左一为巴富羲医生

中：汽车下坡时的惊险情景

下：骆驼队拉汽车横穿纳林河（东河）的情景



我们快意又兴奋地驾着汽车，轻松地行驶在天津至北京 80 多英里的公路上，这是我首次在中国的公路上驾车。当我离开故里时，心想我驾车的日子也结束了，如今却再次欣喜地坐在汽车的方向盘前！驾驶仓非常舒适，有四排挡的变速箱和极佳的启动设备，驾驶起来和轻型汽车没有多少差别，我确信驾车会成为我在旅途中的乐趣。当然此行比较轻松也离不开一位来自山西的同行者——德文兰 (Deck) 小姐有时替换我，她驾车的技术仿佛是天生的。

写好这封信很不容易，因为有太多的事想告诉你们，而篇幅却有限。假如信中讲了两件事，便可能另有六件也值得叙述的事；所叙述的事情本身或许并不太有趣，但这些事却在一系列事件中，能起连结作用。

9 月 8 日傍晚，我们的两部汽车上了货运火车，准备开往张家口，实地状况可从稍后我们寄回的相片中得知。这是一次独特并令人激动的行程，汽车装载在无边板遮拦的平车上，沿途的风光可以一览无遗，在火车穿越南口山隘时，景色尤其美丽，请看看我们在车上午餐的照片吧，各人的位置虽不很整齐，但很有情趣。

火车到达终点站张家口之后，我们将汽车卸下来，驶往卫理公会的宣教园地，途中稍微遇到了一点困难。在宣教园中我们受到 Soderbom 夫妇和 Williams 夫妇的热情接待。对他们几位的盛意我不可能都讲，但我要特别感谢 Soderbom Senr 先生，在我们逗留的整整三天时间里，他几乎是不停和不倦地为我们工作，他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争取为我们拿到汽车的行驶证和驾车的驾照；在与蒙古向导敲定报酬的事上，也帮了我们的忙。当我去天津接收汽车时，便已获悉将会遇到的最大麻烦，可能就是在张家口通关受阻。于是给在上海的海恩波 (Broomhall) 先生 (即本书作者，也是内地会刊物“亿万华民”的主编——译者注) 写信，请他特别为此事代祷。你们中间曾为此事代祷的人，一定都盼望得知神垂听你们代祷的详情。遗憾的是：新闻检查部门要求将交涉经过的绝大部分内容保密，所以我们只能在此向你们报告这重大喜讯的结果。9 月 13 日早晨，

我们驾车到达关卡检查站，耗时仅十分钟，便与检查人员握手告别，正式踏上了去新疆的难忘旅程。

上路的第一天，我们便开始对以前一无所知的内蒙道路有了切身的体验，我想可称它为“头等的”道路，弯弯曲曲，凹凸不平，还有许多陡坡，只能缓缓开行。引擎是新的，轴承也很坚固。为避免引擎过热，沿途曾多次临时停车以散发热量。水是充足的，需要的是多一点耐心，因为我们很快就察觉到不时停车以保持引擎正常工作很是重要。傍晚时分，我们见到一个名叫黑树河的小村庄，便决定在那里过夜。以前曾听说过一些有关中国小客店的情况，而当晚则是首次住进了中国的小客店，令我既欣喜也惊讶。当我们从车上取下所需物品进行晚炊时，我们的汽车引起村民的好奇，在一群蒙族村民的围观下，我们盥洗、烹调、吃饭、铺床。我在当天 (9 月 13 日) 的日志中是这样写的：“张北县境内路况之差，是我从未经历过的，那是一条多么坎坷的路面啊！突然‘砰’的一声，汽车陷入泥穴并被卡住，我们对汽车进行了首次“挖掘”的操作，我恐怕不能用“走好”来概括头一天的行程，因当我告诉你们当天只走了 54 英里时，可能会使你们对路面之差有所了解。日志中也记下当晚的住宿费用为美金 1.6 元。临行之前还花 40 美分买了一袋马铃薯，它一直伴着我们到达新疆的哈密。

两辆汽车在路上一直被称为什么仁志的车和巴富羲的车，为便于在叙述时加以区别，我也沿用了这样的称呼，分别将它们叫做何仁志的车和我的车，我俩分别驾驶各自的车，而柏爱生则轮流替换我们二人，实际上在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之前，团队中年龄较轻的成员都曾参与了轮换驾车的工作。

次日我们在黎明时分出发，何仁志的车因引擎点火有点麻烦，稍微耽搁了一点时间，下午我们在一个名为罕特因苏木 (Hattin Sumu) 的蒙族小定居点上作了短暂的停留。瑞蒙宣道会 (Swedish Mongol Mission) 在此有美好的工作，我们有幸受到一位蒙族牧师和一群学校孩童的接待。傍晚时，我们进入 Larson 先生的营地，他

曾是斯文哈定探险队的成员之一，有“蒙古公爵”之称，同他在一起的还有 Lattimore 夫妇（Lattimore 就是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的作者），数年前，胡进洁先生曾在新疆见到过 Lattimore 先生，如今又在此地重逢叙旧，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次日的车道将我们引入起起伏伏的草原地带，大部分路面尚好，但决不要把这里所说的“好”与苏格兰或英格兰那边的主干道联想在一起。据我日记中的记载，白天行车的最高时速曾达 24 英里左右，但不久发现，在此等路面上行驶不宜过快，于是降低车速，将时速保持在 15 至 20 英里之间，车速虽已减缓，但仍需时刻警惕，一时的疏忽大意，极易招致灾难。越过一片高地之后，夕阳在慢慢西沉，远眺一两英里之外，仿佛有座美丽的小城，被四周的小丘环绕，向导说那是一个宏大的喇嘛寺庙，并说喇嘛不会向我们释出善意。于是我们便继续前行，越过一条河之后，将帐篷支搭在安全的地带过夜，全天行程超过 100 英里。翌日清晨的景色令人印象深刻，当我走出帐篷时，旭日的光辉正照射在喇嘛寺庙的白色院墙和华丽的建筑上，十分夺目，在四周人烟稀少的草原上，竟伫立着一座如此壮观的寺院，实在奇特。

此时车上汽油的储量，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因为数日来的实际耗油量，大大超出了行前的预计，并且短缺的趋势日益明显。如果按目前的耗油量推算，肯定开不到乌鲁木齐（新疆的首府），当天正午我们到达了百灵庙——旅行团队必经的重要交通枢纽——竟在该地得到 50 加仑汽油的补充，令我很高兴。在此我顺便提一下，我们最初预计需汽油 360 加仑，为保险起见，带了 450 加仑，但以后你们会明白就连这 500 加仑汽油都不敷全程之需。

离开百灵庙，顺着驼队所走的路线，向下一个重要的地点额济纳河进发，沿途超越了许多旅行者，他们或骑在骆驼及马驴的背上，或坐在牲口拖拉的大车中，也有徒步行走的人，多半是蒙族。驶行 110 英里之后，在一个名叫柴达木（Chindamun）的小居民点上搭篷宿营，当地只有两三个蒙古包而已。

“羊肠子沟”是 9 月 17 日星期六那天日记的标题，我作为“官方记者”在日志中写道：“在沙子和石头成堆的河床中，只行驶了 24 英里”，对于我们全体人员、羊肠子沟确是自然界中的一处梦魇之地，在此我们要应对出发以来最困难的处境。我从未想要别人把我们当作杰出的司机，也不想夸大我们的成就，只希望你们知道，我们在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险境中是如何蒙主保佑的。当黄昏来临时，我们越过一道宽阔的河床，进入一条狭窄的溪谷。地面上全是散沙，两辆汽车都陷入沙中。经过挖掘，在众人推搡并伴随着引擎轰鸣的拉动，终于将一辆车从沙中弄了出来，开到坚实的地面上。再用此车将另一辆曳出，以车曳车这还是头一遭。

次日是星期日，没有开车，大家在帐篷中平静度过。偶尔有路过的蒙人到帐篷前面打探，我们花 7 美元从一人手里买到一只绵羊，交给向导 Cerat 宰杀，制成味美的羊汤和羊肉，使大家饱餐了一顿。

让我援引 9 月 19 日星期一的日记：“令人失望的一天”，但这不能拦阻我们向主发出赞美，因为祂是美善，祂保护并看顾我们。我开的这辆汽车在启动之后，便发出撞击的声音，并且越来越响，时而像来自后轴，时而又像来自万向节，尽管加了油，在机器部位搽油，检查传动系统中可触及的部分等各种办法都用上，却仍未能查明产生噪音的原因。一直折腾到上午九点半，才动身缓缓向前行驶。此处真是以往从未见过的地区！汽车一次又一次倾斜到几乎要翻倒的危险角度，先是开在前面的我那部车陷入沙中，靠自己努力，总算将车给弄了上来，但接着何仁志的车却在沙中陷得更深，经过相当吃力的挖掘，和使用宽度在一码左右，又长又牢固的帆布带裹着几股绳索，才将车拉出。两小时后我的车又陷入泥浆，何仁志的车绕到另一条路上，把我的车曳上来。几分钟之后，我的车再陷进了一个大泥坑，用锄和铲挖了半个小时，才得以从坑中出来。到下午一点半，我的车所发出的撞击声实在太大，才决定停止前进。一天开四个小时，仅走了 16 英里。

第二天清晨我们被一阵狂风暴雨惊醒，倾盆大雨一直下到傍

晚，根本没法修车，大家只好躺在床上休息，停止前行。

再次日清晨起身后，迎来了光辉的一天。经过短暂的测试，决定先移开后轴和转力桿再查看，这是件很繁重的工作，大家同心协力，中午时分终于移开后轴，底盘也清洁了。进一步检查时，发现万向节中有一个轴承因为缺失了保固的弹簧而松动失控。原因找到了，但如何修理成了问题，想在这空旷的内蒙荒野上找到相同的零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向导 Cerat 突然从早上意外打破的热水瓶的碎片中，找到一个热水瓶中配置的弹簧，稍经加热和弯曲，竟然制成一个非常合用的车用弹簧。再将众多的拆散零件重新装配起来，既要细心，也很费时，好在人多力量大，到傍晚时分，后轴终于被重新装配到原来的位置上。

让我引述 9 月 22 日的日记吧，我希望能向朋友们介绍内蒙的黎明——六时半日出时的灿烂辉煌。上午做些零星的修车工作，十一时半结束，下午二时出发。开始还算顺利，但接着有几英里像是走在“丛林”中，当汽车沿着干涸的河床边沿行驶时，河堤突然松动，我驾驶的汽车的后半部随即向下面滑陷，幸亏后轴以一个惊险的角度，将车身挂住，才避免了坠车的事故。车顶部的两名男仆脱身较快；可 Cerat，赵立德和我三人却因两边的车门都被外力压紧而不得不从边窗爬出，以往我从未见过汽车会达到如此接近颠覆的程度，在处理这次意外的过程中，显出了主的奇恩。原本以为要花一天时间才能摆脱困境，不料只用了两个半小时，便在出事汽车的后面修复一段路面，使另一辆车得以上前相助，Cerat 的驾车技巧令人惊叹。到当天停车宿营时为止，仅行进了 28 英里。

次日我们本打算多开行一些里程，但我的日记有助于说明努力的实际结果是什么。9 月 23 日清晨四时一刻起床，天真凉啊！头顶上还挂着皎洁的明月呢！当天一直忙活到晚上七时，行车时间有 11 小时，不过只前进了 70 英里，期间能用最高档开行的路程不足 5 英里！每辆车的日耗油量为 16 加仑。修路是一天中的主要工作，道路之崎岖无法描述，连一辆小轿车都难以通行的路面，要让载物后

近两吨重的货车通过。

9 月 24 日又在清晨五时起床，刚过七时便开车上路。这一带是多山地区，有不少条干涸的河床分布其间，我们挑选了一条干涸不久，看上去还行的河道作为车道。在比较顺利地行驶了若干里程之后，我驾的车突然陷进淤泥，事先竟无任何迹象，我们跳出车外才发现另一辆车的命运也是如此。多方努力的结果，非但没有脱困，反倒陷得更深，显然已不可能再沿着这条河床继续前进。只得在这条河床之外修路，并在河堤上挖开一个 3 英尺多的缺口。修一条缓坡通到车旁，又在下陷的车轮周边掘深沟，去淤泥，再填入找来的石块及木桩，想不到周末的时光都耗在这糟糕的河床上了。经过五个半小时的不懈努力，终于迎来了重大的时刻，当我们看到第二辆车也开上了坚实的陆地之后，纷纷将帽子抛向空中，表示庆贺。“让我们动身”——蒙古向导一声令下，我们再次出发了，用二挡的慢速在乡间低劣的路面上开行了 6 英里，并越过一条河床，便正式进入戈壁沙漠，随即停车宿营。速度器上显示，当天只走了 30 英里，但我们已很满足了。

就整体而言，戈壁的表层状况比我们的预想稍好，然而还是过软，徒步都会陷至脚踝，何况载重两吨的货车行驶其上。尽管汽车一次又一次地下陷到车轴的部位，汽车还是挣扎着向前开行。我和同伴们着实经历了一段严峻的时刻，我也越来越惊奇他们高超的表现。分散的小片沙地，同样给我们带来麻烦。常常需要迂回一大段路来规避它们。9 月 26 日我在日记中记着：“太累了——今天轮到我洗餐碟了，一天的行程之后再干烹食的事真是累人。巴不得上海的安德生小姐能见到此刻我们品尝她赠送的茶时，是何等欢畅。今天一路上干了许多挖掘和推车的力气活，戈壁上常见到有石膏碎粒的表层，大卡车在其中虽陷至车轴，但仍能高昂地向前行进，真令人惊讶！其中有段 2.5 英里的路程排挡调至一档以全力行完时，所耗的油量竟超过了两加仑，可见在戈壁中的油耗有多大！此刻我们意识到单靠目前所带的汽油不可能到达新疆哈密！但主用约翰福音

10章4节的话安慰了我们：“既放出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虽然照人看来，在这个边远的世间僻角，补充汽油的希望渺茫，但我将此事交托于主而内心平安，因为直到今日，祂一直是我们的坚固保障。

9月27日一早就遇上麻烦，上午9时我的车开出还不到五码，便陷入沙中，随后继续前进时，就不得不小心避开眼前的小片沙地而多绕行了4英里。当天我们曾停下来一段较长的时间，考虑前行的路线。三年前 Citroen 探险队的车队过此留下的宽阔履带印痕，清晰可见。地表虽极松软，但我们还是尽可能的谨慎行驶，要确保安全。如果告诉你们如今连汽车发动机上带动皮带的风扇轴都因发热到几乎要熔化而突然停止转动，或许会使你们对我们汽车所处的困境有所领悟。

9月28日日记中记载，当天没有离开住地，我们的帐篷搭在一些小丘中，在住过的营地里，这是最为可爱的一处。放眼四望，周围许多里的范围之内，竟看不到一个活物。我们取出足球，像在训练馆中那样，用它来活动肢体，显然这种方式很受欢迎，大家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虽然我曾讲述过行程中的困难，和我们付出的艰苦努力，但不要认为其中没有乐趣，我一直渴望重返此路，并多次听到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也说：“哦，再去一次戈壁吧！”。我不想在此对沿途的景致多加描述——别人或许会做得更好——我只想讲讲9月29日那天发生的一些事。“一早便起床出发了——真不想离开这可爱的营地，巴不得再待上一星期！汽车整天在大山中反复地攀升着，山景十分灿烂。有一次为避开沙土而攀上倾斜度接近四比一的山坡（约合仰角 $15^{\circ}$ ）。我认为如果两辆汽车的后轮相联，将有助于拉动作用的发挥，从而避免单车独行时遇到的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于是产生了一个双车相联的伸长体，它仿佛一条宽大顺畅的公路，载着我们颠颠簸簸，一程又一程地向前行进。速度计上曾显示出每小时达到36英里的记录，你们能想像我们有多么振奋吗？经历了两周的艰苦跋涉，

车速居然还能如此之快！经过了一小片不平坦且散布着令我们害怕的石膏碎屑的地面之后，接踵而至的地带又该怎样描述呢？我想那是我所见过最为美丽而奇特的景观之一。我们越过一个上升的小坡，便进入一片面积颇大的“盆地”，被四周一排排突起的小丘包围。这些小丘五颜六色有黑、有绿、有红、有褐等等。接着又来到一个形似露天剧场的地方，四周是一群小丘，而地面则呈现一连串的特色条带：深蓝色、浅蓝色、深绿色、浅绿色、朱红色、砖红色、暗黄色、黄色、白色——我再说不出来别的颜色（乘车穿行时询问坐在我身旁的赵立德，他也没说出更多的色彩）。这些颜色都不是人为设计的，当我们经过时，注意到地面下的石头和土壤也着上了色，真是平生最令我惊奇的自然景象，它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过去我听说过“彩绘的沙漠”，如今亲眼见到了。一路走来，我们的位置已高于四周的小丘，前面的路程很壮丽，走了16英里的下坡路，路面令我们满意，好似一条巨大的跑道。我的日记记着：“在多日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树木，美丽的沙丘和一条真正的河流……它是额济纳河”。我们迎来了一个伟大的时刻，到达此地标志着我们的行程已走了一半，并且未来的路程要比以往的好走得更多。

离开驼队所走的路，便见到四五顶帐篷，向导说那是中国和瑞典联合探险队的大本营。我们的到来立即在那里引起轰动，并受到 Horner 博士的热情欢迎（我们携带了一封北京友人给他的介绍信）。我们很快被引进他的帐篷，环坐在“桌子”四周的羊皮地毯上，与他们共享国宴般的美食。能见到这位知名的绅士，深感荣幸，从交谈中得知，Horner 博士已有半年未见过外国人了。但随后得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我们根本无法开车越过前面那些本想越过的河流。Horner 博士立即决定，调拨二十五峰骆驼归我们使用，并答应尽力从各方面帮助我们。显然我们必须在此地——吉日嘎朗图（Wayao Toroi）待上几天了。于是主人腾出他的蒙古包给我们住，以取代我们原来所住的帐篷，简而言之，蒙古包就是蒙古人居住的活动房屋，它是将毡子蒙在轻质的木架上制作而成，比我们的帐篷

暖和也更宽敞方便。我无意贬低自己的帐篷，但在防御狂风暴雨以及沙尘暴等方面，蒙古包的确是更胜一筹。我们住在蒙古包中的那几天，就好像在家中一样的舒适。在吉日嘎朗图可以说是过上了挺奢华的生活，Horner 博士不让我们单独开伙，坚持要我们每天去他那里就餐，他待人着实慷慨。我们在额济纳河三角洲的日子就像一次真正的休假，大家都很满意。我在10月1日的日记中，写得很有趣：“坐在折椅上面真舒服，眼前是一片广袤的沙漠，其间散布着高高低低的多色山丘；右侧可见两个小湖，和两个被高树环绕的大湖；后面的一切都融合在无垠而美丽的沙丘之中；左侧是以参差不齐的树木为边沿的内海，四周的美景组成一幅悦目的图画。这沙漠中的湖水真清凉啊！但我庆幸自己不必指望它提供饮水，原来这一切只是海市蜃楼而已！”

暂留的那几天，我们在营地中也没有闲着，一要考虑汽油短缺的问题，二要研究如何跨越额济纳河三角洲中的五条河流，此外还得另找一位向导，因为 Cerat 急于返回。营地中有十个大汽油桶，每个容量为五加仑，它们属斯文哈定探险队所有。出于礼节，Horner 博士将 50 加仑汽油全部划拨给我们，货款则可以付给他们在北平（北京）的总部，这些汽油为我们的汽车能顺利到达哈密，提供了可靠保证。这次旅行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无论在世事上或是在灵命上，主都是我们的供应之源，并且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应该更多地依靠祂，成就祂给我们的应许，而不应生活在恐惧与焦虑之中。对前程的取道，可有两种选择：一是将货物交给骆驼队载运四五天，我们驾着空车先后环绕索果诺尔（Sogo Nor）和嘎顺诺尔（Grashun Nor）两个称为诺尔的湖泊，这样便可避开一切河流。但我们获悉嘎顺诺尔周边的路况极差，如果绕行此湖需要增开足足 100 英里，现有的汽油数量不足以保证此方案的实施。二是我们驾着空车只绕行索果诺尔这一个湖泊，货物由 Horner 博士的驼队驮着在汽车动身前一天出发，走到达来呼布镇（Nogandel1）等候我们的汽车到达。最终选择了第二方案，并决定由石爱乐和赵立德两人

随驼队押运货物。10月5日一早，我们将全部物品从车上卸下，再放到驼背上，当天下午稍晚的时候，驮着行李的驼队与我们告别先期上路，汽车明日出发。我们很留恋这处营地，在此度过的六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我们特别不能忘记那位慷慨的朋友 Horner 博士，他也是此地的主人。

次日驾车绕行索果诺尔，开始的 10 英里很顺利，而随后的 25 英里，却不断遇到含石膏碎屑和沙土的地带，极其难行，尽管看上去路面很平坦，但引擎必须全力开动，每小时的车速不超过 15 英里。车轮总是深陷沙中，天气和暖，热风吹拂，防止引擎过热的水箱也常沸腾，而不得不多次停车使之降温。此刻我们便有暇来观赏索果诺尔，并可走上干涸的湖床漫游，白花花的地面，覆盖着一层盐霜，仿佛雪后的田野，而与之毗连的湖水呈天蓝色，这无疑是能吸引艺术家眼球的美景。在湖边可见的范围之内，竟见不到任何生物，因这两个湖泊的水含盐量都很高，连动物都不能饮用，自然也看不见活物存在。头一段路约在 35 到 40 英里之间，行驶方向为正北，到达索果诺尔的北端之后，便调头南行，此时车道进入丛林，在这片属于额济纳河三角洲的地带，乔木和灌木都很茂密，有时甚至要推车前进。在距我们与另外两人约定会合之处达来呼布镇，只有数英里的地方，暂时离开一直跟踪的驼队行迹，去了土尔扈特（Targot）蒙王府一趟，递上我们的名片。下午四时左右汽车到达达来呼布镇石爱乐和赵立德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对初次驼队之旅感到舒畅，我们高兴地得知驼队在穿越三条河流时，未遇困难。我在日记中记着：“当天绕湖大约耗油 30 加仑，耗水 10 加仑，而全日行程仅略超 50 英里”。

如今我们要面临数条河流中最大的一条——纳林河（又称东河）了。据悉在数日内，水流尚平稳，但总不能将汽车当汽轮来用吧！经过讨论，决定将帐篷移到河边，准备伺机渡河。先要就租用骆驼之事作好安排（因为 Horner 博士那里来的骆驼已返回吉日嘎朗图），租骆驼是用来运送货物过河和拉曳汽车过河。

在此我们要依依不舍地和向导 Cerat 告别了，就在别离之前，他还在渡河工作中帮了我们的大忙，他是一位工作能力很强的向导，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义工，我不知道他的继任者能否像他一样得力。新的向导是位老年的蒙民，以前没有什么出色表现，对向导工作似乎也无多少激情，我们给他起过两个绰号，觉得都不太高雅，最后决定以“Galahad 阁下”来称呼他。

在达来呼布镇停留期间，有众多蒙民和一些汉人来拜访我们，其中最有趣的一次是土尔扈特蒙王王后及其随扈的到访。她先在外面仔细察看那两部汽车，然后进入我们的帐篷，吃了几片我递上的饼干。朱佩儒将留声机拿出来给她看，并播放几张唱片给她听，引起她的极大兴趣。尤其是一张录有 Dame clara Butt 歌声的唱片，当深邃的女中音唱响的时候，竟使她有些神不守舍，不过随后便恢复了常态，和扈从一道摆好姿式，让我们给她们拍照。

从达来呼布镇到纳林河边，不过短短 3 英里，竟让我们走了六个小时，这或许令人难以理解。原来自达来呼布镇出发不到 1 英里，便在浓密的灌木林中迷失了路，到达河边之前，天已经全黑了。接下来的一天是星期日，在营地中度过。天色将晚之际，大家同登附近一座小丘，向主赞美并祈祷，为着主在一路上的引领，唱诗称颂祂的名。我想如果四周的小丘能说话，定会承认此前未曾听到过一首赞美诗。

10 月 11 日星期一，一个准备跨越纳林河的重要日子。清早起床之后，我在日记中记着：“汽车被完全拆解，并搬到准备渡河之处，所有的电气零件都取出来，其余各部分零件均用防水布包裹妥当。第一辆车拆得最彻底，尽可能减轻车身的重量。货物装上驼背，好一派探险队的架势！车身则用挽具分别套在七峰骆驼身上，在三四分钟的呐喊声和水溅声中，车身经过人推驼拉的努力，终于到达了河的彼岸。出乎意料，湍急的河水和河中的淤泥，皆未成为渡河时的重大障碍。第二辆车过河时，因那几峰骆驼有了头一次拉车的经验，所以表现更好。柏爱生驾着车顺利地“飞”过河去。如果那天

早上你们来我们的营地，将看到一派忙碌的景像：胡进洁在烤面包；离他不远的柏爱生正在准备宰杀一只花五美元购来的绵羊；何仁志和我忙着拆解车上的零部件；石爱乐和赵立德在对岸勤奋地进行清理，以迎接汽车的顺利登岸；朱佩儒在等待接收从河中运过去的行李；哦，对啦！此刻也不能忘掉那位蒙族向导 Galahad 阁下，他正坐在篝火旁，一面和蒙族的来访者交谈，一面以一种难以摹仿的姿态抽烟呢！

渡河之后，立即将车上所有的零部件重新组装起来，次日中午时分，行李也都装上了车，准备要西行 50 英里，去渡过第五条河流——木林河（又称西河）。行前我们曾被告知此段行程的路况极差，汽车如果荷载不可能在其上行驶，必须租驼队来运货。经过大家认真的讨论和祷告，没有接受此建议。可以想像，当那天下午六时半穿越此河河水到达彼岸之后是何等的欣喜！汽车沿途几乎未遇任何麻烦，假如我们采纳了原先的建议，就将在如今汽车过河之后的登岸地点，花上整整三天时间来等候驮运行李的驼队，并且还将多付一笔可观的运费。此行得以顺利完成，证明主垂听了我们和你们的祷告。

次日 10 月 12 号星期三，我们破记录地行驶了 120 英里，最后的 15 英里是在夜幕中开行的，汽车前灯的光线足以照明我们所循的驼路。当晚曾听见狼嚎，但在途中全部的宿营地点中，无一处遭受过狼群真正的袭扰。在北平（北京）时，Soderbom 曾对我说过：“戈壁是世上最平安的地方”，事实确是如此，戈壁之夜的安详静谧只有身历其境才能有所体验。以前曾听说在戈壁沙漠之旅的后半程会遇到更多实际的危险，进入新疆之后，方才真正知道，的确各方面都有着对我们构成威胁的巨大危险，但主的旨意永远不受拦阻，只要我们能用单纯的信心来侍奉祂。从 10 月 14 日我们进入新疆的那天开始，一个严峻的时刻就来临了。

我在 10 月 14 日的日记中这样记着：“现在我们位于海拔较高之处，冬季的寒风猛袭过来，一上午行进得非常艰难，需要另择一

条较为舒坦的路，但向导 Galahad 阁下心中也没有底。遥见远处有两个人带着三峰骆驼和两匹马，这是三天以来首次见到的生物。当我们和他们的间距拉近到数百米时，这两人突然同骑一匹马向一些小丘中飞速奔驰而去，显然是对两部汽车的快速驰来感到恐惧。当汽车开过逃逸者驻足之地时，见到三峰骆驼及一匹马正安详而耐性地等候主人。此后约有一小时之久，我们偶尔仍能见到三峰骆驼，却再也没有见到那两位逃离的人。”以下是另一段日记：“看到了十来个竖立的怪异角锥，这是被废弃的昔日边关标志，昭示我们已正式进入新疆。新疆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寒冷，荒凉，看不见植物，而且只能取得含盐量高的咸水。当晚夜宿 Ming Shui，次日清晨，温度计上显示气温已降至零下 10℃，寒风刺骨，采用平日用插入手柄旋转的方法，已不能使引擎发动，只能生火先加热引擎冷却器中的水，再发动汽车。”

10月16日星期日的日记：“壮丽的场景——我们出行以来最堂皇的一处营地！它位于一个小山谷中，北风吹不进来，数米之外有条淙淙流淌的山溪，北面远处耸立着 13000 英尺高，山顶被白雪笼罩的哈尔里克山，南面广阔的戈壁平原犹如大海，难道还能找到比此地更佳之处来欢度周日吗？然而周边的时局严峻，不宜久留，我们只能不很情愿地收拾行李尽快上路了。”

我们没有声张，便悄然驶进哈密，直趋胡进洁先生和冯贵珠 (French) 及盖群英 (Cable) 两小姐曾住过的那家小旅店，在该处逗留两星期，受到店主力所能及的款待。我对他的慷慨感到惊讶，因他从不向我们收取任何报酬，并且还总是觉得对我们照顾不周，所以当我有机会为他的妻子治病的时候，心中特别高兴。到达哈密时，每辆车都只剩下 10 加仑汽油了，这最多还能再走 60 英里，当初我们不清楚张家口与乌鲁木齐（当时称为迪化）之间的确切距离，也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汽油，由于无知，自以为所带的汽油能满足全程之需。然而主并非不知道我们的缺乏，在神的爱中，旅途上每一站路的需要都能及时获得供应，一无所缺。余下的旅程又将如何？

让我重复一遍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主是供应之源，超过我们梦寐以求的期望”。

在去奇台的旅途上很有趣，虽然没有值得特别一提的事；但能准许我们驾着自备的汽车行驶就不错了，想要了解此段路途的情况，不妨翻阅冯珠贵与盖群英两位小姐合著的“Through Jade Gate”一书中第 209 页的内容，只需将书中“马车”一词改为“汽车”就行了，她们详叙了自哈密至乌鲁木齐的全程经历。在奇台停留六天，然后再往前行，最后的 130 英里真够舒心，路况极佳，只走了六小时，11月9日中午进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这真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我们也会同时记住马尔昌 (Mather) 先生对我们的热情欢迎，我们的到达，结束了他对我们的长期等待。当天晚餐以后，我们一同唱诗祷告，特别为沿途各地蒙神信实的扶助感恩。在此信中提及了一些神为我们所行的事，但未写出来的，尚有许多。我可以真切地告诉你们，神垂听了你们的代祷，赐下“特别丰盛”的恩典。马尔昌先生给我们念了诗篇 118 篇，诗篇中所写的内容，好像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在我即将结束这封长信之前，还想提请你们注意这次旅途中的一件令人希奇的事，在中国境内一条长达 1800 英里的交通线上，我们仅到过—个宣教站——只有这一处是公开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中心。我们经过许多村庄中的居民将来怎样？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生活的部落将来怎样？众多蒙族聚居地区如额济纳河三角洲将来怎样？新疆一些较大的城市又将怎样？如果人们连独—真神的名字都未曾听过，又怎能信祂呢？如果没有传道的人，又怎能听见呢？这难道不是对那些为中国福音事工代祷者的挑战吗？这难道不也是对那些在本国为自己—生道路寻求神旨意的年轻人的挑战吗？“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太 9：38）”。

## 中国的新疆

新疆曾经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的突厥斯坦 (Chinese Turkestan) 它面积广阔，几乎为德国，法国和西班牙三国面积之和，是中国各省之中最大的一个，有数百万各族民众散居其间。它位于中国西北的遥远边疆，海拔达到 20000 至 25000 英尺的群山绵延，犹如一堵高墙从三面将新疆的大部分包围阻隔，使其通往外界的道路崎岖难行。新疆的东边是蒙古大沙漠，南边是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然而这片与四周隔离的地域，也是古代文明摇篮之一，两千年来，尽管新疆曾多次发生过恐怖的叛乱和大规模的杀戮事件，但始终没有完全脱离中国的掌控。大部分土地虽很干燥，但仍有许多丰腴的绿洲。像埃及一样，考古学家也曾从新疆的沙砾下面，发掘出古代的宝藏。约在五十年前，此地正式建制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取名新疆，具有“新的疆土”之意。

聂斯脱利派 (Nestorians) 是一个早期的基督教派别，在唐代传入中国之后被称为景教，曾一度在新疆传播过，从古代礼拜堂的残片和当时基督徒墓地的遗迹中，可以得到证实。例如曾在一处墓地遗址找到至少 612 块刻有叙利亚文字的墓碑，叙利亚是当时聂斯脱利教派的大本营。然而时隔不久，民众对基督教的信仰热忱，便被随后传入的伊斯兰教和佛教淹没，在持续多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新疆的人民就再也听不到基督的名字了。

近代最先来这片亚洲腹地传播基督福音的人，当推 Landsdell 医生和巴格道 (George Parker) 先生，后者是内地会早期进入中国内地开荒布道的成员之一，时间在 1876 年。他曾在新疆的东部旅行并散发六种文字翻译的数卷《圣经》，直到 1905 年才由胡进洁先生在首府乌鲁木齐建立起内地会的中心工作站，数年后马尔昌先生加入该站，最近又有胡立礼 (Ridley) 先生加入。乌鲁木齐以西约一千公里的莎车和喀什一带是瑞典传教士的作工场所，罗马天主教在新疆的工作也很积极。

新疆的人口是多民族的混合体，在新疆如果能说几种语言，会感到称心。多民族中有来自内地各省的汉人；回族是完全说汉语的穆斯林；维吾尔族被汉人冠以“戴头巾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方言；蒙古族笃信佛教；土尔扈特蒙古族曾是准噶尔的一个独立的民族；柯尔克孜族是一个与其他民族分离独处并游牧的穆斯林；塔塔尔族可能是鞑靼游牧民族侵入欧洲时，与被掳欧洲妇女生育的后代；满族是两百年前乾隆王朝时期赴新疆戍边者的后代；众多俄罗斯族，其中大部份是当今苏维埃政权下的逃亡者。面对如此庞杂的民众，传教士可以有充分发挥其语言才能的空间。不过介绍新疆并非我们的主旨，建议对于新疆情况感兴趣的人，去读一读前面曾提到过的那本书——Through Jade Gate。

内地会为这片辽阔且未曾听到过福音的地区制定了宣教计划，这是中国内地会总体宣教规划“前进运动”的一部分。计划中的男性传教士先进入新疆，而其中的女士则到甘肃加以考核之后，再去新疆。我们务必应该记住冯贵珠和冯贵石两姐妹及盖群英，她们是到达新疆的传教士中，仅有的三位女性。

作为中国的遥远边区，新疆有一部充满风暴的历史，汉族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曾多次引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近年随着邻邦俄国革命成功，又产生了一些新的不安定因素，一方面苏联国内共产主义思潮，广泛地向新疆境内传播，对现政权构成潜在威胁；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白俄官兵，因逃避新建立的苏维埃专政统治，越境进入新疆，并逐渐成为对新疆社会有影响力的阶层。最近这股势力有进一步引起政治动乱的趋势，他们携带武器，在各地乡村流窜，对民众进行威吓与掠夺，甚至敢向政府挑战，是一支可怖的队伍。

民国建立以后，新疆的当权者实行独裁统治，采取与外界分开与隔离的政策，邮件往来须经严格检查，不准外省的报纸进来，就连人员的进出也非易事。

由于前任新疆地方首长（指曾任省主席的金树仁——译者注）



采取高压手段，导致近年穆斯林暴乱频繁。哈密是新疆三座穆斯林的圣城之一，全城分为汉人聚居区和穆斯林聚居区两大部分。维吾尔族自元朝成吉思汗开始至今，一直延续由亲王进袭的封建统治制度，清真寺的建造时间，可追溯到公元1420年。然而当1930年沙木胡苏特亲王病故后，金树仁非但不承认他生前选立的儿子聂兹耳袭爵，反将其软禁在乌鲁木齐，不放他回哈密，并另派一名汉人替代；他又设计杀死了一位蒙族的多尔济活佛和两名他手下的头目。如此不公的举措，导致维吾尔族和蒙族联合起来造反，发生了哈密事变。这场地区性的叛乱由于装备精良的回族青年匪首马仲英的加盟而阵势扩大，使哈密成为多起军事冲突的中心地区。马仲英从甘肃方面为哈密的动乱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援，叛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金树仁在新疆的统治。金树仁急于招募纪律性较强的士兵来充实他那支军纪涣散的中国军队，于是越境从苏联逃过来的俄罗斯人，便成了他吸纳的对象。他成功的招收到两千余名俄罗斯人，组成归化军，依靠他们对哈密进行了五个月的包围与封锁，迫使马仲英率部队东撤回甘肃，才勉强控制住哈密的局势。这便是1932年10月巴富羲及其同伴途经哈密时的真实情景，他们居然通过了两军对峙战云密布的哈密，於11月9日安全到达了乌鲁木齐，着实令人感到惊讶。

[译者插介：从1931年2月持续至1932年11月的哈密事变只是全疆动乱的导火线，1932年底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等地农村，都出现了反金树仁的游击队，而且声势越来越大。1933年1月起，各路叛军汇合北移，乌鲁木齐外围不稳，终于在1月29日将战火烧到乌鲁木齐，爆发了南北疆全面反金的新疆事变。]

1933年1月29日星期日上午，当乌鲁木齐市内的信徒正在举行主日崇拜时，穆斯林发起突然的攻击，全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住在城郊，不在城墙之内，所以此后数周，城门一直关闭，严加防守。两千余名俄罗斯归化军中的首批分遣队于1月17日到达，其余的人也随后从阿尔泰地区及其他地方调来。

2月21日星期二，住在宣教之家的少数人员，被枪声惊醒，原来是叛军在与俄罗斯归化军激烈交火。经过一番战斗，叛军退却了，但住在郊区的穆斯林平民，却遭到灭顶之灾，房屋夷为平地，男女老幼遭屠杀，财物被掠夺。

到三月中旬，有更多的俄罗斯归化军抵达乌鲁木齐，实际上绝大多数归化军均已到达。这些部队带着三千峰骆驼的货物，那不是粮食，而是士兵在各地掠夺的财物。同时向乌鲁木齐集结的，还有数千名东北军，他们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被逐出，途经苏俄的西伯利亚来到新疆，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其战斗力远超新疆当地的武装力量。

金树仁很不走运，一方面对待俄罗斯归化军的举措失当，惹怒了他们，另一方面，穆斯林又与归化军暗中达成默契，只要归化军能取得金树仁的首级便与之休战。4月12日俄罗斯归化军果然攻入督署“衙门”，去捉拿金树仁，并强占了兵工厂。金树仁趁着他的卫队同归化军对击的时候，仓皇携带眷属越后墙逃走，后去塔城越境进入苏俄，再转往中国内地去了。

新一届的新疆政府，由一个重建委员会协商产生（盛世才成为督办——译者）。由于苏联及其它方面的影响，有了新的新闻检查机构，建立起一个比以前开放和进步的政权。但仍有些急待解决的问题：诸如对穆斯林群众的安抚，稳定货币，开放交通等等。在首府乌鲁木齐地区，虽然不再为战事与不幸所困；但据报载莎车、喀什及其他中心点仍深陷恐怖的混乱之中。

以上对新疆的描述虽然简单不全，但已足以用作阅读下面巴富羲信件时的背景资料。遗憾的是，在新疆政局动荡的日子里，巴富羲医生所写的信件，不如先前在旅途中那么多，原因是在新疆事变的过程中，医疗工作非常繁重，巴富羲是惟一能挑大梁的医生，其余的两位医生，一位是受过计安全医生（Cox）培训的中国医生，另一位是年迈的俄罗斯医生。他手上总有做不完的事，为救治重伤员和惨遭遗弃的士兵日夜操劳。当然大多数信件是解除新闻检查之

前所写，而最后两封信，写在新闻检查解禁之后，去世之前三周，当时他正在全力以赴，无休止地为伤员施行外科手术。

## 最后的信函

1932年11月9日，巴富羲医生一行到达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距离驾车从张家口出发的日子，恰好为八周零一天。在此期间，只有三周零一天是真正在旅途中行进，其余五周，则因各种原因而被耽搁停留在不同的地方了。到达目的地的那天，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巴富羲由乌鲁木齐发回英国的首封家信中，提及他收到了大量待阅的信件，很是欣喜，信件均来自英国本土，有五六十封之多，像是一桌丰盛的宴席。

尽管他不想宣扬自己，但在这一行刚到新疆的人群中，有位外国医生的消息，还是很快的传开了。他在英国的亲友们对此颇为关注，希望这消息不至于使他过多地侧重医务工作；然而在他到乌市半月之后的信中写道：“我不必担心能否在此行医了，因为目前人人都知道我是医生，真可叹！事实也确是如此，一位学医的传教士，尚未学会中文，便整天被病人围着，真是件憾事。”他不仅难以保证学习中文的时间，甚至连写信的时间都难保证。他搬进新寓所一个月之后这样写道：“打岔最多的事便是医务工作，除了行医我还能作的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再这样下去，可能连一点别的事也不能作了。”

行医时遇到的另一问题，也在同一封信的后半部分提起：“各种液态药剂，都在打开之后才拿到我的房间里来，上周室内的平均气温为零下5℃到零下8℃，这比正常溶液所需的温度低了13-16℃，各种水剂都冻住了！更为雪上加霜的，则是许多外科器具生锈很严重，上海天气湿热，物品极易生锈，我足足花费了两天时间，才将器具全部清洁和擦油完毕，并储藏起来。”

显然他曾被问及为何不乘飞机而要驱车穿越沙漠，在1932年12月17日的信中，他是这样说明的：“数日之前，一架客机飞抵此地，开出返回上海的机票票价，每张为1,400元美金，随身行李限重10公斤。而光是我带的医疗用具就有100公斤。如果筹划用骆驼运货物，在路上得走上两三年，而且运费很高。我们曾考虑过亲自组织骆驼队穿越沙漠，那至少需要四十峰骆驼，走完全程需要四个月。而我们最终选择汽车旅行，耗时只有两个月，如果不是中途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到达时间还可提早一个月，因为实际开车的天数只有22天，据估计实际支出也仅为预算的一半”。

“在谈到飞机的时候，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预计不久将开通此地至沿海的定期航班，以后紧要的信件，在四五天之内，便可寄达上海……”。

“星期二我希望为病人作个小手术，遗憾的是：动手术的环境很不理想，这里没有医院，有些患者的处境非常可怜。两天之前，有位几乎全瞎的病人前来就医，左眼已完全失明，这是当地一位好心的理发匠替他修面时，因操作不慎导致面部溃疡的结果，我用不着再提别的了”。

他下一封信是圣诞节当天写的，这是他一生中首次不在家中度过的圣诞节。当天对于一般家庭或许并无特殊意义，但在巴富羲心里，却有与往年过节情景强烈对比的特殊感受，是马尔昌先生给他带来了节日的欢愉，他觉得与马尔昌先生彼此意气相投。他写道：“马尔昌先生来自英国兰开夏，曾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虽然已四十六岁，但和我们一样充满青春活力，看上去甚至比我还年轻，想不到他来新疆竟有二十年了。因着我们的到来，岁月的印迹仿佛在他身上消退，我知道他乐见我们来到这里”。

作为一位初来乍到的人，自然会谈及对于当地情景的一些观感，为此我们就摘录一段他信中的文字吧：“本市有不少外国人会说英语，Kierkegaard先生是丹麦人，他妻子是挪威人，他是新疆的邮务长，能说和我同样流利的英语，其余的外国人大部分是德国人和

俄国人”。

1932年的最后一天，也是他离别英国故土一周年的日子，他给最小的妹妹写了一封长信，此信的价值在于这是他有暇谈论自己的最后一封家书。他写道：“你肯定会记住这个日子（1932年12月31日），一年前的今天，我在维多利亚车站向你们告别……，今天有多少该向神称颂的事啊！真的，我几乎被回顾一年来神为我施行诸多奇事的纷繁思绪所淹没，日前我对自己说，我为主舍弃的何等少，我对主赐给我的丰盛恩典有了更深的领悟。假如十八个月之前，我能预先知道这一年中的遭遇，无疑会感到代价太大，付出太多了；但如今我会静下来思考，我为主舍弃了什么？这样的反思使我对现状完全知足，并有真正的喜乐……，我已经学会透过主去看待各种困难，而不是透过各种困难来看主……”。

“如果一个人能毕生无条件地向主降服，那么主要为他作的事和主要用他去作的事，都将是没有限量的。我深信这便是蒙福的秘诀——当然说说容易，要行出来就是另一回事了。一个人只有靠着圣灵的帮助，才能向主降服，向主降服和勉强顺服神的旨意是不同的，降服不是消极的事，而是非常积极的事，降服建立在坚固信心的基础上，深信神为祂自己荣耀的缘故，必定悦纳向祂献身的人，对我而言，领悟这一亮光是近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信件的全文很长，无需多加援引，他的小妹是他惟一愿意表露自己心迹的对象，信中的话展现了一位愿意终生与神同行者的心态，也显示巴富羲对他自己及别人尚不够虔敬的不满足。他知道不一定能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但他自己是不会丧失这崇高志向的，他信中写道：“我不是神学家，每次神学的辩论，我都败北，每次神学的讨论，我总被驳倒。”他怀着一颗切慕神犹如鹿切慕溪水的心，度过了人生最后一个完整年度中的最后一天。

1933年1月6日，他再次提笔写了以下的话：“这是1933年写的头一封信，不知道今年能有多少信会由现址寄发，这很难说”。

一周之后，当他感到现实生活与在英国作执业医师毫无二致，

要想安心认真地学习中文有多难的时候，便在另一封信中勾勒当时的生活情景及工作情况，并论及乌鲁木齐市内的诸多民族。他写道：

“我们能自由地与不同的民族交往，我和各族的人民都有过接触，你们知道我不会讲德语，但每句德语我都听得懂，这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石爱乐是会说德语的，于是我们有幸能接待不少客人”。

“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族和汉族的信徒，都会定期去参加聚会，虽然迄今只有汉语的聚会。胡进洁先生和马尔昌先生在翻译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编纂字典，将“天路历程”及部分圣经译成新疆不同民族文字的版本。新疆也有满族，但尚无满文的译本，希望今后有人来作此项工作，你们知道要熟练地掌握一种特殊语言，须有多年的学习和使用才行。”

“生活在新疆这样的多民族的省份里，至少需要通晓两种语言，才能开展工作。马尔昌先生的汉语很流利，还会讲土尔扈特地方（在原苏俄版图中）的蒙语，他能用这两种语言讲道，而且特别喜欢在蒙族中作工。他也能讲维吾尔语，并未专门学过，是靠与该民族交往而会说的，他对俄语也熟悉。胡进洁先生和马尔昌先生数年前合编过一本满文字典，并将“天路历程”译为维吾尔语。如果认为新疆已经完成了不少文字工作，那就请记住，还有更多文字工作有待进行。”

每逢主日礼拜堂里总是坐满信徒，真令人高兴，但这不够，我们希望见到更多的人能无所畏惧地公开表明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这在新疆并非易事，在伊斯兰民众中，更是如此”。

当巴富羲渴望学习中文时，发现自己的医学知识竟成了学习道路上的拦路虎，对此在信中曾多次提及，他这样写道：“你们会包涵一封毫无属灵信息的信函吗？我非常的忙，根本顾不上学习，昨天我作了一例风险很大的手术，从伤员胸腔中取出一粒子弹，它射入右肺，紧靠心脏上方，我判断它在一根折断的肋骨后方，事实果真如此，它埋在一堆受损组织的碎片之中，病人获救了。在没有X光片的条件下，要进行这类手术很不容易；但目前我得学会在没有优

越条件的环境中工作”。

2月19日，叛军攻城的前三天（这次攻城引发的战斗令他余生全部投入了繁重的外科救治工作），巴富羲在所写的信中，为当地缺乏一所正规医院深感忧虑，想不到三天之后，便果真急需一所医院来救治数以百计的重伤员。他写道：“你们能够想像一个有七万居民的城镇竟没有一所医院的情景吗？只要设身处地的想想，就会明白我为何难以静下心来继续语言的学习了。离这里最近的教会医院在新疆西南部的喀什，有四十五天的路程，假如星期日休息，则要走上五十天。而离我最近的内地会同行，则在更遥远的兰州医院中，去那里有六十天的行程。新疆全境面积有五十多万平方英里，而医疗设施竟像一张白纸，你们想得到吗？”

在前一封信中，他也表达了对环卫状况的担忧，他请求本国同胞想想，一个拥有七万居民的城镇，居然没有任何排水系统，其环境卫生状况糟到了何等地步！他为每年有许多人被伤寒、斑疹伤寒、赤痢、白喉和猩红热等各种传染病夺去生命而深感悲痛。但他不曾料到数月之后，自己也将加入这些死亡者的行列。

2月20日离叛军偷袭的军事行动开始，已经不到二十四小时，他写了以下的信：“又一件打岔的事——但是件很重要的事，马尔昌先生刚来找我去看他那顶刚运到的大帐篷，请听听它的来历吧！记得在去年四月或更早些时候，我曾告诉过你们，两年多以前有批货物从上海运出，总共有八个箱子，却一直未到新疆，如今终于全数到达了。多数箱子里装的，是各种文字的圣经和属灵的小册子，大家早就以为它们丢失了。货物在途中整整走了三年半，是驼队经由蒙古运来的，途中曾被武力胁持到库伦（即现今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后虽被放行却又在不同地点遇到不同的麻烦，最后，这个由众多骆驼组成的运行队，终于在昨天到达乌鲁木齐。马尔昌先生喜出望外，同时也分给我们一些当前需作的工作。”

随后寄来的数封信里，由于信件需要检查，对乌鲁木齐被穆斯林叛军包围和攻击的事不能提，2月25日叛军向乌市发起攻击后四

天所写的一封信中，对实情竟半字未提。一周之后他写的另一封信也是如此，信中主要谈及去年在途经戈壁沙漠时拍摄的那些相片，他不敢将底片付邮寄出以免遗失，但手边又没有印相纸将相片印出。那时他的全部时间，都用到尽力救治伤员的工作中了。

3月25日，他在信中写道：“很抱歉，将近一个月没有写信给你们，这决不是因为懒惰……每天从早到晚十分忙碌，尽可能多做手术，其余的年轻人则从事敷药及包扎等工作，他们干得太出色了。我的业务范围包括各种外伤治疗，切除手术及修复手术等。我也治疗过脓胸和多例骨折：其中股骨骨折六例，桡骨和尺骨骨折三例，肱骨骨折三例，以及膀胱穿孔，胸腔和腹腔穿孔等由枪击导致的一切伤害”。信中虽然只字未提新疆困局的真相，然而读者可从字里行间清晰地推断出那里发生的事情。

拼搏的生活在继续，下面的信是4月6日写的：“我几乎忘记了写信的技法，我有一个多月没有写信（除了3月25日所写的那短短的一页），如今突然有了一个赶寄航空信的机会，于是匆匆地涂写几笔……我非常非常的忙，不是忙于学习。近来我做了大量的手术，几乎令我力所难及，其余的年轻人管理病房，只在必要时来找我，收治的伤病员已超过三百人。如今我才明白1914年开始以后的几年中，外科医生在法国所干的是什么工作（此处隐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科医生在法国战场上救治伤员——译者注）。我为先前积累的医疗经验感到庆幸，其余的人都表现英勇，他们做的裹伤工作和我在英国曾经做过的一样完善，真是时势造英雄啊！虽然对语言的专门学习停了下来，但在医疗工作中，我们有很多机会练习口语。我们同样也有了向伤病员分发四福音单行本的良好良机，这比仅仅治疗他们的肉体重要得多，我们希望人们的心灵能有根本的改变，更甚于仅仅将必朽坏的身体治愈”。“从去年二月抵华以来，已有过数次惊心动魄的时刻，但没有一次能与现时的形势相比，我们都好，并且心情欢愉，大家都在期盼远方亲友们的来信”。

在前面一章里，述及原来的新疆地方政府在4月12日被推翻了，

当天俄籍归化军攻占了政府的军火库，试图捉拿省主席，同时也宣布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使境内与外界的通讯比以前开放。“四·一二”政变后的第五天（4月17日），巴富羲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给他的小妹妹写了一封较为详尽报道近况的信。在目前我们手边所掌握的信件中，这是他患病之前亲笔所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谈及医疗的事。他写道：“我很想一开始便能就政变的经过作长篇叙述，新闻检查制度取消了，所以我希望告知你们全部真相，不过眼下还办不到。那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主却奇妙地引领我们走过来了，当枪弹嗖嗖地从我们四周飞过的时候，我们从不惧怕，我已收集了许多子弹，将它们作为此次战乱的纪念品”。

“一开始，我根本不想参与任何与医院有关的工作，因为我在学习语言方面，已经远远地落后了。于是其余的年轻人和马尔昌先生决定去一位马姓的中国医生那里帮忙，后来应前省主席（金树仁一译者注）的请求，我同意主持救治紧迫和严重的伤员。我安排五位年轻人和马尔昌先生协助我给动手术的伤员包扎及一般护理，所有伤员的伤势都是子弹和刀剑造成的。随着伤员不断涌入，我的工作量越来越大，我有一个不算大却蛮不错的手术室，石爱乐在那里作我的助手，还有两位中国男仆。马医生负责麻醉技术，马尔昌先生有时也参与相助。这位天主教神父的医务工作能力极强，到后来他收治的人数近三十名，当他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到他那里去动手术。”

接下去他在信中向学医的妹妹详述了处理创口时，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场，或许有的读者不想看到有关的描述，因为那些内容显示刀砍的伤口有多么可怕，子弹射击的后果是多么致命。

他写道：“我走进医院，便见到五位大腿遭受复杂骨折的伤员——可怕的光景！处处充斥着污浊的恶臭，试想一下，三百名伤势不同的患者，在两周或更长的时间内，竟无人照看，这是多么悲惨啊”！

“terrific”（可怕的）这个词，不止一次出现在信中，该信讲述了一段悲惨恐怖的经历。全信以下面一段附启作为结束：“我如今负责一所在三周前新建立的医院，每位年轻人负责一个病房，我比

过去任何时候都忙，医院缺乏设备，药品也少，医院工作人员只有发挥各人的独创能力去工作”。

乌鲁木齐受到数万叛军六周的包围与攻击，据说有数千人死亡，城郊战场的惨象令人难忘。

现在要引述他亲笔所写的最后一封家书了，日期为1933年5月6日，信文如下：“近日我已毫无雄心壮志，甚至连给你们写信的意念都失去了，最近三天我再也无法继续奋斗，连写信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或许当时他还不清楚，这些体征正是致命疾病的发端，接下去他写道：“我没有片刻能关照自己，恐怕这就是我如今患病的原因。有天深夜，还来不及穿上足够保暖的衣服，便骑上骏马匆匆奔向城外，有位俄国官员和两名士兵与我相伴，另有一位白俄首领同行。我骑的马很淘气。多次试图将我颠翻落地，奔跑起来犹如风驰电掣，在到达目的地时，我已大汗淋漓。此地白天炎热，夜间却十分寒冷，在返回途中，等候城门开启，竟达半小时之久。沿途无论是在城内或是城外，都有哨兵密布，如果没有知道口令的军人随行，肯定会遭射杀。夜间进城不易，要在寒峭中长时间的等待，患上感冒就在所难免。当然每天工作忙碌，睡眠时间严重不足，也是患病的诱因。有四百名伤员被收容在三所临时成立的战地医院中，其中的一所由我组建，收纳伤势最重的125人。”

他说这些伤员在转到他这里之前，有一两个月甚至三个月没有洗澡，他们的创口，衣服及被褥的状况如何，可想而知。他写道：“没有一位官员来察看过我们的工作，或询问过我们在做什么。更为糟糕的是官员不管病人的饮食，也不向华籍医护人员支付报酬，导致他们罢工，并从超额工作的外国人手下离去。”

“三个月来的遭遇，令我洞悉了当前中国人生活的内幕，如果没有这次机会，或许得费时多年才能了解。我诊疗过英国人、俄国人、汉族人、蒙族人、维族人、满族人和哈萨克人，今天甚至有两名波兰人找我看病。幸亏他们都粗通汉语，我也对付着说汉语为他

们诊治。如今我已学会不少俄语，并能用简单的俄语，蒙语及哈萨克语提问。在我的医院中有蒙族人，马尔昌先生照看他们，他的蒙语说得很好，还有维族人和回族人，当然还有汉人。我当然无力照顾到乌鲁木齐市的居民（每逢婉拒一例病人，总会有恶语相向——作者），你们也许要问，为何要如此辛劳？但如果你们亲眼目睹了这些病人的光景，就会明白我不能不为他们做些事情。”

这是他所写的最后一封信，其中有部分内容不能向读者公布，不能让读者了解全文，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旧的新闻检查制度虽已取消，但并不等于允许一位传教士能将其所见所闻的全部都公之于世。巴富羲超负荷地连续多日工作，以致献出了生命，便足以证明信函的内容是真实的。

## 至死忠心

巴富羲最后的信是5月6日星期六那天写的，整整三周之后，他为神和传教之地的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愿用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所写的一首诗，只更换诗中一个代词来表达对他的追忆：

再进一步，他到达了人生的终点；  
再说一语，他干完了终生的工作；  
再劳一刻，他背尽了基督的十字架  
夕阳西沉，一日工成。

他顺从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在侍奉中蒙祝福，在降服中享安息，为着主的事工和拯救灵魂大发热心，至死忠心。

为了无人治疗的病患者和濒死者，他不顾自己在最后的信中所提的严重病情，写完信以后仍然打起精神坚持工作，写信之后的第五天他彻底垮了，在病床上一卧不起。此前三天，马尔昌先生也发烧被迫卧床。在那所孤寂的宣教前哨里，年逾七旬的胡进洁先生和一位新来同工，围绕在两张病床前，用爱心毫无保留地尽全力照料

他们，一开始还不确定他们所患的究竟是伤寒还是斑疹伤寒，然而一切人间的关注都未能挽救他们宝贵的生命，马尔昌先生5月24日安睡在耶稣怀中，三天之后，巴富羲也随之在主怀里安睡了。

他们被安葬在城东一处山地之中，从此长年安息在这片为之献身的土地上，直到神的末次号筒吹响，那时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经上所记的话：“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林后5：4）”就应验了。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林前15：58）。”

（柏爱生先生在六月初的报告中写道：“巴医生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毫无保留地去抢救伤员，他对工作的认真，不仅让我们深受激励，而且令城里的每一个人对他心存感激，政府中的大小官员公认他是个义薄云天，舍生取义的人。政府追悼他的挽联上写着‘舍己救人’四个大字”——译者转引自有关资料。）

## 何竟如此？

1931年5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巴富羲从刊物 *China's Millions*（亿万华民）上面读到那篇呼吁年轻人来华布道的文章；整整两年之后，1933年5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他结束了地上的侍奉，将灵魂交给赐他灵魂的神。前一次神呼召他离开故土，去中国为神作工；而后一次则是神召唤他脱离在中国的事工，回归天家。两次蒙召的间距竟如此之短，难免令人萌生种种疑窦：如果第二次召唤来得如此之快，为何还会有第一次呼召呢？人生的真谛为何？我们能用在世存活年日的长短来衡量生命的价值吗？在来世永恒的光辉中，他会因为今生侍奉时间的短暂而显得逊色吗？巴富羲对他的侍奉有何想法？他的家人有何感触？我们能说什么？难道可以用人间的标准来判定属灵的事吗？有时如果我们能够自律，不从众发表凡夫之见，或许会是一件好事，诚如诗中所云：

之处，神将要作一件何等奇异的‘新事’！

从各方面来看，我都满意神为他所作的选定，完全满意。我不敢替他作如此美好的选择；但我喜乐，因为远比我爱他的那位主作了这样的选择。‘我的心哪！你要称赞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要称颂主，让我们一同赞扬他！’主啊！眼下对我没有难处，一点也没有，你的作为尽善尽美。

我弟弟给我的这封在他归天之后我才收到的信中还谈及新疆的工作，任务重大，困难特多，而后提到主的应许：‘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接着又说：‘我无论在什么景况中，都未见过神会中断活水的供应，但我绝对相信，避免活水中断，离不开禁食祷告。’

你们是否会想，由于两位神的儿女相继去世，神预定流往新疆那片干旱土地的活水将减少？我认为恰恰相反，他们的离去是祂计划中的一部分，为要增添溢流的活水，我相信这也将成为你们中间有些人要领受的信息，所以谈了这么多我的感受，与你们分享。在我耳边不断响起来自各地为数众多的召唤声，但我只能回应其一，我对此颇感困惑，要作的工是那么多，但工人却那么少。我不向神求问，该去新疆或留在此地，我只求那位赐生命的主，现在就将他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你愿意向祂完全献上自己吗？祂必定向你施行奇事——“惟祂是配。”

巴富羲的父亲，从英国寄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噩耗传来，对我们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震撼；但不久我们又重见蓝天，重闻鸟鸣，心中也再度回荡起感人圣歌的旋律。对神的信靠使我们获得完全的满足，祂仁慈地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并扶持我们直到今日。以往我们曾多次求主，使巴富羲的一生和侍奉有美好的效果，配得祂的称赞与荣耀，并乐意让神来选取以何种方式应允我们的祷告。”

最后要提到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位亲属，便是巴富羲最小的弟弟。他不仅平静地接受哥哥去世的现实，而且将哥哥工场上的需要，看作一次对自己的挑战，若是能行，他愿去弥补哥哥的岗位。

只是为了巴富羲所信的神的荣耀，我们才公布这些属他个人隐私的细节（他于1934年来华宣教，取名巴辅胜——译者注）。最后还要补充一句，已有一位医生和他妻子决定奔赴遥远的新疆。

当巴富羲医生抵达新疆未满七个月便染病身亡的消息传到英国时，我们会惊异地问道：他的生命“何竟如此？（to what purpose？）”被倾倒在呢？这是个年轻而亮丽的生命，充满希望与志向，又受过长期高等医学教育，在新疆那片辽阔的土地上，几乎可算是惟一合格的医生；然而却在一生的工作刚要开始的时候，被砍倒了。我们多么容易想到，假如他没去新疆又将如何呢？然而基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所说的话昭示我们：神的评判非同我们的评判，神的意念也非同我们的意念，惟有祂才有权决断一切的事。

有件值得在此追述的事，巴富羲和他的几位同伴，是内地会发起的“二百人去中国”运动中，最后出发的一批。起航前，在伦敦举行了告别会，W.H. Aldis在会上讲到马利亚拿一瓶极贵的香膏膏主的事，并着重将门徒的看法——“这是枉费”，与主的评判——“在我身上作的是件美事”二者进行对比。美事中“美”这个词，原文kalos在Liddle和Scott编辑的希腊文字典中的释义是“公正可爱的”，或作“道义上的正确和美好”解，如今当我们审视在神光辉中的人生时，人的意念与神的意念仍会有巨大的差异。

香膏从打破的玉瓶中流出，屋里就满了香气，马利亚真切的奉献，使主的心得到完全的满足；然而犹大和另外几个人对此却愤慨地说：“何竟如此枉费呢？”此后不久耶稣向神祷告时，用了一个含义极深的词“灭亡之子”来称呼犹大。在原文中，“灭亡”与“枉费”是同一个词，犹大责备马利亚枉费香膏，然而在主看来，犹大才是可憎的“枉费之子”。他错失了许多应当悔改的宝贵机会，滥用了主赋与他带着钱囊的特权，亵渎了主对他的无上关爱，他虽升到天上（指被主立为使徒），终因枉费了不可再得的财宝（指他不信主）而坠入阴间。神和人的价值观，表现在膏主事件上的反差竟如此之大，在全部圣经中尚难找到第二例，值得我们深思！

当我们悼念巴富羲将命倾倒的时候，应记得基督关于至贵香膏的教训，并祂多次说过的话：“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得注意的是，在主所说的话中，这是惟一一句在四福音中都有记载的话，并且是主在不同的场合说的。一次在呼召十二使徒时，一次在责备彼得试图让祂避开十字架时，另有两次是祂将完成在世使命，即将面对极其痛苦的死亡时说的，这就是神的生命之律。但我们的心往往相信和领会得太迟钝了，当我们发出“何竟如此？”(to what purpose)的询问时，基督的回答是：“这是一件多结果子的美事。”

## 尾 声

圣徒的忧伤只有一天，  
圣徒的喜悦直到永远。  
将你的希望与志愿寄托于前景。  
沿着狭窄的小路高歌赞美神。  
在肉体软弱时，要激扬对神的赞美，  
受世事伤痛时，要提升对神的赞美，  
当撒但在暗中吼叫时，要大声地赞美神，  
对它千万次的谎言说“不！”  
魔鬼，死亡，地狱三股合一的绳索，  
并不会在你面前轻易的断裂；  
要用十倍的坚定去面对它们：  
大卫！不要吝惜争战时的呐喊，  
身躯，气息或鲜血，都将在恩惠中作证，  
为你的主死，一如你的主曾经为你而死。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 译后感言

尹道明

1931年既是巴富羲医生离开故土英国来华宣教的年份，也是先父母尹任先和丁素筠蒙恩得救的年份，同时还是我出生的年份。

巴富羲生前和先父母并不相识，然而“To what purpose”这本并不很厚的书，对我的家庭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小的时候便从父母那里得知巴富羲弟兄的感人事迹，并深深印入脑海。这本书也一直珍藏在家中，直到1966年才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成为“破四旧”的对象被毁。

原著於1933年岁末完稿出版，立时便被先父母购得。次年(1934年)7月1日我的二哥尹道恪和二姐尹德惠经天津转赴北戴河参加夏季培灵会，在途中遭日本人预先暗置在火车车厢内的定时炸弹炸死，一时间成为震惊全国的重要新闻(图1)。当时二哥道恪信主的时间虽然不长，却非常渴慕真道，并有意辞去在上海华业银行中一份报酬优渥的工作，“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次旅程原拟在南方和带领他们得救并去北戴河领培灵聚会的贾嘉美牧师(James R. Graham Jr.)一同出发；不料临时因故推迟了一天动身，事后贾嘉美在一篇纪念他们的专文“Arthur(道恪)and Grace(德惠)”中写道：“I thought of that later and considered how differently things might have turned out if they had been with me that night instead of delaying a day”

(事后回想，如果当晚他们能与我同行而未推迟一天，那后果会是多么的不同啊！)

對於如此重大的意外变故，先父在所著的“圣光指引”一书中写道：“我们一下子失去了两个儿女，内心的悲痛难以言宣，所幸我们有主的生命，相信主所作的不会错，并知道他们是先於我们到主那里去了，心中得到主赐的极大安慰。”主赐给他们的信心和极大安慰，正源於阅读“To what purpose”一书得知了巴富羲医生的事迹和家人在他病逝以后对主的坚定信心。



题，坦陈劝慰之言。校友与会期间，我还从校友新疆农业大学教授朱以方弟兄那里，得知新疆乌鲁木齐教会近年蓬勃发展的喜讯。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我又想起了“To what purpose”这本曾令先父母受益良多的书，并渴望能再读一遍。

於是我向戴绍曾大哥求助，他起先未能在香港找到，后来才从英国获得。2003年5月我收到了他寄之书，十分高兴，打开一瞧，更令我惊讶，此刻不正是巴富羲诞生100周年（生於1903年）和离世70周年（死於1933年5月27日）之时吗？想不到这三个时间点竟然会如此巧合！重读之后，备受激励，产生译成中文以飨华人的心愿并得到戴绍曾大哥的鼓励与支持，翻译工作便这样开始了。

随着翻译的进展，启示录14章13节常在心头萦回：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想了解巴富羲弟兄为主献身之地——乌鲁木齐教会现状的愿望便油然而生。然而曾住在乌鲁木齐的圣光校友朱以方弟兄已去世，而我又认识当地教会的人。

感谢主！在兰州多年侍奉主的周恩莹老大姐介绍我与乌鲁木齐中华基督教会的范晨光牧师取得联系，并从她那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佳音。巴富羲医生的坟墓，在文化大革命中，居然毫发未损，而且已于1979年6月1日迁往东山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的墓地。每年复活节前后，都有众多的弟兄姐妹去公墓纪念他。而具体开坟迁移骸骨的人，便是她弟弟范重光弟兄，当时他是新疆大学医学院二年级学生，对搜集整理骨骼有一定经验。她还告知巴富羲的一位在加拿大的侄孙 Philip 已经于2006年到访过中华基督教会，由她儿子路加弟兄负责接待，陪他去了巴富羲医生墓地悼念，因他能用英语与 Philip 交谈。于是我决定对乌鲁木齐教会进行一次亲访，并去巴富羲弟兄的墓前追思。2008年10月24日从杭州乘飞机启程。

因航班晚点，次日凌晨一时才到。一出站便见到迎候多时的范晨光牧师和她的先生路恩照弟兄，路弟兄驾车送我到旅馆休息，上午由范牧师陪同到明德路中华基督教会见到该堂另外两位年长的同

工：88岁的黄清治牧师和90岁的陈孝卿牧师（图7）。在和他们亲切交谈并阅读所赠的“感恩特刊”之后，对乌鲁木齐市及新疆全区教会的历史及现状均有了一定的了解。“感恩特刊”是乌鲁木齐基督教协会于2005年为纪念明德路堂复堂二十周年和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建立六十周年而编印的，其中有这三位牧师及其他信徒所写的文字35篇，及多幅照片。1933年巴富羲救死扶伤而染病身亡的那场内乱平息以后，军阀盛世才上台统治新疆逾十年之久。他将内地会的福音堂改为监狱，没收了内地会的全部财产，内地会的外籍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有些本地的信徒也入狱为囚，神的福音工作受到毁灭性打击。黑暗的统治导致民族矛盾加深，政局不稳，1944年8月底，国民政府将他调离新疆，去了重庆。

正如想要害主的希律死后，主的使者告知约瑟要带着主耶稣和祂母亲返回以色列地一样，1945年春季，主也安排了一位内地会的基督徒李开焕，带着妻子翟明霞姊妹，因工作调动的缘故，从西南边陲云南昆明邮局来到西北边陲新疆乌鲁木齐邮局。他们一到，便立刻在家中恢复了聚会，并在报上刊登聚会启事联络信徒。后又借用省药房的一间大会议室，作为每周主日礼拜的场所，与会人数与日俱增。到1946年，教会为了推进福音事工，需要购置面积较大的专用场所。恰逢此时，张治中将军来乌鲁木齐兼任新疆省主席一职，他捐法币一百万元，加上信徒奉献的二十万元，便以这一百二十万元国人自筹的资金，购买了明德路1号的平房院。当时共有房屋34间，占地一千多平方米，先打通其中三间改为礼拜堂，采用内地会的《颂主圣歌》为诗本，定名为“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图9）”。

1995年在原址上新建的六层高楼落成以后，更名为“基督教会明德路堂”，是当前乌鲁木齐市的十七处基督教会礼拜堂中，最大的一处（图10）。目前全市各聚会点信徒共约两万人左右，全疆信徒超过五万人，而解放之初，全疆信徒尚不足千人！

1946年远在陕西凤翔圣经学院和山东潍坊灵修院中，有两群信仰纯正热心爱主的青年，同蒙圣灵感召，志愿去西北传扬福音，分

别成立了马可牧师负责的“西北遍传福音团”和张谷泉牧师负责的“西北灵工团”。在两三年中，共有数十人长途跋涉，历经艰辛，到达新疆各地传扬福音，对新疆教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来新疆的漫长征途上，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见证。现今负责明德路堂事工的三位牧师中，陈牧师和黄牧师以及范牧师的父亲与母亲都分别来自“西北灵工团”和“西北遍传福音团”。他们不仅在本堂同心牧养主的羊群，而且还关怀乌鲁木齐市“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林前 1:2）。乌鲁木齐市众信徒在真道上合一的见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牧师说，“西北遍传福音团”的成员在出发时，对旅途的详情知之甚少，他们离开陕西，进入青海，本想沿青新公路一线行进，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将军，直辖甘、宁、青、新四省。当他从马可牧师那里得悉此事，便立刻电令青海省主席马步芳赶快派人将他们追回，并引上经兰州西进新疆的路线；避免了一次将要陷入无水沙漠中的致命危险。先父是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时的财政厅长并领他得救，此后他热心主工，与先父等共同创办了以传扬福音为主旨的圣光学校任董事长；又在乌鲁木齐教会置产和保护来新的基督使者等事上，起了关键作用，不禁令人想起古时神曾感动古列王准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一幕！（图 8）

在黄清治牧师，范晨光牧师及其弟范重光弟兄等的陪同下，我带着“何竟如此”的译稿，专程到 75 年前病故于此的巴富羲弟兄墓前追思（图 11）。30 年前曾代表教会出面联系迁坟，并写诗一首（图 12）的黄老牧师，在坟前领祷之时，宝贵的经文：“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 14:13）顿时浮现脑海，内心激动，热泪盈眶。念及巴富羲弟兄千里迢迢，来到乌鲁木齐，却仅度过了短短的两百个昼夜，便在主里面而死，息了自己的劳苦；然而他作工的果效，不还是显明在墓前站立之人的身上或家中吗？“何竟如此”初版不久，便给突遇丧子之痛的先父母，带来莫大的安慰；黄牧师和范牧师及范重光

弟兄的母亲路得姊妹在西北圣经学院就读时，都曾受教于巴辅胜教士，他正是为了继承其兄巴富羲弟兄的遗愿，才决定来华宣教的。我也深信，手中译稿的出版，将会使他作工的果效更为显著。

范重光弟兄向我讲述了在动手迁移巴富羲弟兄骸骨过程中的一些所见。原葬的墓地俭约而精致，墓碑上刻有英汉两种文字的墓志，棺材离地面一公尺，棺板较厚，有 6-7 公分，棺外周边特地环撒一层防水的白灰，显示当局对他的礼遇。开棺之后发现尸身的衣着及皮肉等均已腐朽，但全身骨骼保存完好，看得出他生前的个子很高，连细小的耳骨都能找见。在骨骼下面，铺垫着厚约 20 厘米，长短不一的白色羽毛使尸身保持干燥。花了五六小时，共搜得遗骨 206 块，迁葬到此处。比巴富羲早三天病逝的马尔昌教士，安葬在毗邻的墓中，我们也在他的墓前进行了追思。

短暂的造访结束了，依然是范牧师伉俪热情送我上站，依依作别。在“何竟如此”书中，巴富羲的大姐巴若兰教士谈及巴富羲写给她最后的一封信，是在他死后才收到的，信上写道：“我对‘新事’有了蒙福的领悟，以赛亚书 43 章 19 节所说神要作的‘新事’，是一个永不失效的现实”。这是何等深刻的理解，也是何等深邃的远见！70 多年之后，印在新疆教会“感恩特刊”封底上的文字，正是这段经文中所指的‘新事’——主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巴富羲弟兄如同亚伯一样，“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来 11:4）。开道路必有土石被碾，开江河必有泥沙被挖，玉瓶破碎香膏才能流出，被浇奠在坛上，方能成为馨香的火祭。亲爱的读者，假若有一天，你遇见意外而顿生何竟如此之疑时，期盼本书也能助你领悟，那是神在你身上所作的‘新事’。请相信主对彼得所说的话：“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约 13:7）。

本文行将搁笔之际，获悉敬爱的戴绍曾牧师于 2009 年 3 月 20 日在香港病逝，安息主怀（参阅附录）。多年以来，他始终关心译稿的进展，寄来参考资料，抱病校阅初稿，还念念不忘译者请他作序的邀约。离世之前一个月时，身体已极度衰弱不再会客，却破例接

见妹夫王湘衡和妹妹尹德馨，用微声向他们口述本书的序言（图13），这恐怕是他生前最后的一次会客和宣教。愿我们长远缅怀这两位侍主忠心至死的义仆：救死扶伤直到生命行将终结的巴富羲弟兄和劝勉信徒直到生命行将终结的戴绍曾弟兄。末了也向所有热心赐教的亲友致谢。封面题字为妹夫王湘衡手书，他也是资深的外科医生，一位巴富羲弟兄的同行。

书稿于2009年5月27日（巴富羲弟兄逝世76周年的日子）校改完毕，排版付印。又于2011年9月1日（先父母蒙恩得救80周年的日子）增订完毕，再版发行。

### 附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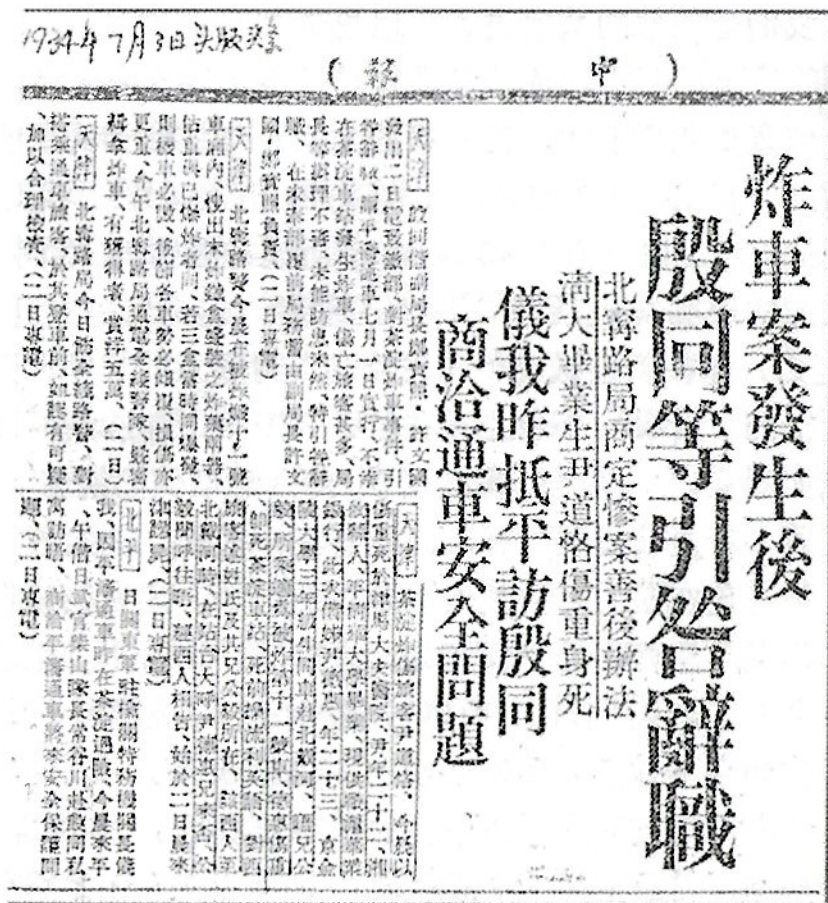


图1：上海“申报”头版头条报导火车被炸惨案

這位由蔣介石委員長於1936年元旦任命的河南省府主席商震(Shang Cheng)，在被指派作內政部官員前，已是一位將軍。當晚，他按慣例盛裝打扮，穿綢緞製的官服，短而無袖的黑背心，準時到達尹廳長的家。-----

他突然打斷沉思，從座椅上站起來，說明辦公室還有待辦的事，希望隔天早上十點，賈嘉美和尹任先能到他的辦公室，教他更多這段七百年前奇妙的預言。

隔天一早差五分十點，兩人準時等在主席公館的會客室。十點正，商震出現了，他誠懇地歡迎他們，詢問他們用過茶沒有，就把椅子拉近賈嘉美，說：「告訴我更多昨天你講的事。」賈嘉美不慌不忙的解釋上帝在歷史中的計劃，還有神羔羊為罪獻

祭、被殺，以及再來治理全地等。賈嘉美表示這主題是和個人有關的，並且有必要在神面前認罪。他熱切的問：

「那麼我該怎麼做？」

「跪在我的旁邊，宣告基督是主。你願意這麼做嗎？」

「當然，我願意！」賈嘉美於是帶著他跪在美麗的天津地毯上，做了決志禱告。他像孩子般真誠熱切的話語，賈嘉美很清楚地感受到他從信主那一刻起，已經成為主的小孩。

賈嘉美寫道：「我在那兒時，商主席從未缺席過晚上到尹廳長家聚會。即使受邀去他家晚宴，談的也是神的事。」

图2：河南省主席商震信主之经过



图3：贾嘉美在台湾陪同葛理翰（即葛培理）晋见前总统蒋经国（1975年）

**省府在鄭禁煙記**  
 福記借農行款煙土作抵  
 省府議決銷燬以免流毒

特貨三萬三千餘兩化為灰塵

貨，以該商收，銷年行農銷次，轉不決為特行，項既：見省煙委尹千行，以具處者關既禁禁煙經委示可，抵貨不懸，在禁禁各員任餘扣，既與河府，係之絕處行，員處能在此押不得滿因農是海方節，先兩抵河，無行辦南辦宜抵規時辦政共會理，事，業已破該工場決而，于，兩南，回係法省本探借定期邊院世繞，辦當實許三，業公銀州心處已十張經記社，續，辦案取欠，，將請議，法由上萬萬餘，司石商，環誌二節省公訊，可公省加扣有債農此付此行決，該附數一和未于鄭人用此各日恩府到：能郵政處貨效而行項察案政，總行貨年手扣能二分福河案報赴，會特河，，府接悉辦來扣在處察院悉，第呈還，餘存歸十行記詳經，鄭常議三農，不此得收敗法，存士以交檢餘，五請款出兩該還三透公誌過茲，監志議決萬王，前項電，移，行之尚在禁示予，五省，未，公，年支司如，探視議決萬王，已扣後商交電本貨無分烟，以，四府已解作司該時款，下具悉，消三派三

仰府農人常至照油農下○百項長由，鄭李先燃議又後務而交繼請行為官有，云禁行之張下存食行午七五扣李鄭鄭後連一，，提，院呈，由，仍發官，○銷燬毒三年都廢所一十貨樹縣公，珍日并派經除長，尹以照銷存，決牲物氏五，等有時四八眼落地安即赴晚定尹五兩冊施，任責前，未便直接，心款，當時一物田，兩包同，方局會鄭，八張七遠示于，先解慎增，加便直接，項開自始時，地載，，點一法長同佈由月常二禁照七，于，由法直，成，殊在時即完火引內至數毛驗研院傳第俗農十三次烟准月，來此省毒接，值所付返茶培火，鄭自實，到，良一，工二委委發，二，召項府，成，得不之注灰沖焚以城相三財場派列區尹銀日員員察省十，赴摺自後，晉計一，燬天燒木西符萬大，容，阮氏行執移會處府九，趙摺自後，入，煩此，，榮北，三小將記并專等行行視選外本日，盧星行紀接，啟省，告尹直拍煤碼於千四前書商員到長，銷決，准奉，時，銷星每

图 4：“河南民报”报导焚烟经过



图 6：纪念圣光建校 60 周年的校友合影



图 5：1965 年在台北举行的“追思感恩会”（前排中央自右向左为圣光校董张静愚夫妇及教员 Snyder）



图 7：明德路堂的三位牧师（陈孝卿（右一）黄清洽（右三）范晨光（右四））

在飞迪化前,我已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sup>①</sup>(直辖甘、宁、青、新四省)兼理新疆省主席。这其中还有一个经过,就是在抗战胜利后我原定派往东北组织东北行辕,当时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国内和平是中心关键,我只想为国内和平尽一点力量,而东北可以兼顾全局,又是当时国共两党、中苏两国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我是愿意去的,连人选部署都作了初步考虑了,忽然因伊宁问题又改派我往西北,我就不能不答应。但是我只愿充行辕主任不想兼理新疆省主席,并且还提出邵力子先生和蒋经国二人请蒋考虑选择。蒋未允,我最后不得不同意兼理。所以这次到新疆,不仅是中央的代表,又是地方负责的军政长官。

四月四日到迪化,五日即接见伊方代表。他们首先对我奉派兼理新疆省主席表示欢迎,并对中央表示感谢。 张治中回忆录/张治中著,一北京:华文出版社,

图 8: 张治中出掌新疆的经过



图 9: 明德路堂原先的门景



图 10: 明德路堂的新堂全景



图 11: 在巴富義墓前追思

(自右至左: 范牧师、译者、黄牧师、范重光)

## 附 录

“活出不平凡”——戴绍曾博士 1929 年 8 月 12 日-2009 年 3 月 20 日

戴绍曾博士是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的曾孙，他当过二十年神学院院长，十一年海外基督使团的总主任。1991 年卸任后，与夫人赖恩（Leone）移居香港。1994 年与两位同工一起创办了国际医疗服务机构（简称 MSI），并担任此机构总裁达十年之久。

1994 年 5 月四川省卫生厅与 MSI 签订合作意向书，邀请 MSI 协助医疗服务。从此 MSI 便不断安排资深的有医护专长的国外人员到四川和云南两省内与 MSI 签合作协议的地方，开展服务与培训当地医疗人员。短短数年间，服务范畴扩展到会计、畜牧、英语教学、社区发展等多个领域。

MSI 要求其成员不用口传福音，只用手献爱心，MSI 的会歌就是“爱的真谛”（词为哥林多前书 13 章中的内容），在宗旨中清楚地写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十五年来，已先后派遣了三千人次到中国内地来服务，动用的资金达数千万美金。四川省曾两次将代表本省最高荣誉的金顶奖授予 MSI，国务院也向 MSI 授过友谊奖。2007 年 4 月 4 日位于四川省山区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授予戴博士“荣誉市民”称号，既表达当地民众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也表扬他对该县发展所作的贡献，有 300 人出席颁授仪式。

戴博士卸任 MSI 领导职务后一个月，即发现患了肝癌。然而他与癌症抗争时间之长，超出许多医生的预测。从神的手中，多支取了五年的宝贵时间，继续服侍祂！2008 年癌症带着末期的威胁复发时，戴博士没有让各样的检查，医生的约诊，磨人的治疗支配其生活。曾两度去探访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的灾区：绵阳和北川。2009 年 2 月生命垂危之际，仍以极其微弱的声音向贴近他嘴边聆听的同工嘱咐，要对中国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尽力相助。

戴博士的安息礼拜在香港举行，在台北与新加坡另有追思礼拜。

蒙主天召渡重洋  
功果垂成葬大荒  
愛主香膏不枉費  
迪化仍放聖燈光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日  
黃清治寫

為巴大夫馬牧師遷坟詩

图 12: 黄牧师写的迁坟诗



图 13: 戴绍曾牧师口述本书序言

在四川省会成都市和该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也有追思会，成都的追思会由四川对外友协与 MSI 联合举办。

2009 年适逢戴绍曾博士八十华诞，他将神所赐的卓越才能和无穷精力，毫无保留地投放在服侍人的事上。他所作的一切，都充满了基督的爱，他活出了不平凡的人生。

#### 计量换算表

- 1 英尺=0.3048 米
- 1 码=3 英尺=0.9144 米
- 1 英里=1.61 公里
- 1 平方英里=2.59 平方公里
- 1 海里=1.85 公里



巴富羲医生的坟已于2010年10月迁至乌鲁木齐教会新墓地“安息园”的中心区内，墓碑下刻出此书，书上有英文和中文的书名。

## 《何竟如此》閱讀雜記 子衿

近来常常听到一种论调，教会规模一定要做大，一定要得到社会的承认，一定要成为社会的主流，似乎惟有这样才能成为造在山上的城，才能成为照在世界的灯，才能在人前作见证，才能将荣耀归于主。于是，需要巨型教会的呼声，也不可避免地日益高涨。

我们姑且不论其中的神学问题，或者参与者的心态如何，只想就荣耀神的话题从近来拿到的小书《何竟如此》中，寻找一些答案。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哪哒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可 14:3-5）

书名便是引自以上的经文，在大家对这段经文没有切身的体会时，或许会交口赞誉马利亚的义行，称赞她的爱心；但如果我们置身于当时的场景中，是否还能有相同的看法？

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在一个小型的家庭聚会里，有一位姊妹拿一瓶价值 6、7 万元人民币的香膏，膏抹在与我们近三年以来一直朝夕相处的老师身上，无论她是用什么恭敬的方式去膏抹，我们作为旁观者能赞叹得出来吗？更遑论这些人，从老师到学生经济都很窘迫。还不知道明天有多少地方要去，不清楚未来有多少道路要走的时候，看到价值昂贵的香膏被如此使用，我们的反应应该和这些门徒是一样的。

《何竟如此》的原本于 1933 年由内地会（现今海外基督使团前身）出版，用以纪念他们差派至中国，抵华仅 16 个月便安息主怀的巴富羲 (Dr. Emil Fischbacher) 医生的小册子，记载了他来华的经历。这本薄薄的，包括封面、序言、作者感言、译者感言、附录资料图片等总共不超过 100 页的小册子中，既没有恢宏庞大的架构和场面，又没有精辟高深的见解和论证，更没有轰轰烈烈的教会复兴

发生，何以能感人至深，激励了更多的人继续为主献身传道？

本书伊始，就能看到巴富羲充满了曲折和艰难的赴华宣教生涯，与其在英国受感蒙召并参加赴华宣教团队时的诸事顺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果在英国的前期准备阶段视为上帝为他打开去中国宣教之门的绝佳印证，那么他抵华第一站吴淞口的炮声隆隆；赴皖学习中文的曲折旅途；接受分配前往新疆宣教后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长达 2000 英里（3220 公里）的穿越戈壁沙漠赴疆行车路程中所经历的奇妙保守与帮助……，这一切的事件都在继续支持这个观点。但是，当我们习惯性地以为巴富羲医生从此就可以在新疆为主做大工，行大事，显异能的时候，这一切的传奇却嘎然而止。这位饱受主恩保守和带领的巴富羲医生在抵达目的地乌鲁木齐后不到 7 个月，就归回主的怀抱。他没有倒在布道的讲台上，更没有殉难于异邦宣教的冲突里。只是，默默无闻地死于为当时新疆内战的伤兵治疗而感染的伤寒中。

这一定会让有一些追求行大事，作大工的基督徒发出和当时那些门徒们一样的惊叹：“何竟如此枉费”？难道上帝在英国对他的呼召，以及在中国种种近乎不可能克服的艰难中所得到的引领和帮助，只是为了让他甫至新疆就倒下吗？福音的复兴在哪里？教会的见证在哪里？信徒人数的增长在那里？缺少这些期待拥有的成绩，他的一切经历似乎都黯然失色。如果说从他 1931 年 5 月最后一个周六蒙召，到 1933 年 5 月最后一个周六结束他在地上短暂的生命和事奉的两年里有什么成绩可言的话，可能只有身后得到的几句称赞：

柏爱生先生在六月初的报告中写道：“巴医生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毫无保留的去抢救伤员，他对工作的认真，不仅让我们深受激励，而且令城里的每一个人对他心存感激，政府中的大小官员公认他是个义薄云天，舍生取义的人。政府追悼他的挽联上写着‘舍己救人’四个大字”——译者转引自有关资料。（《何竟如此》p55）

难道是他的心志有问题？这些后果是由于他一时的热血冲动？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寻找答案：

### 1. 家庭的教导

他出自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导，他的父亲有一个宏伟的心愿，就是希望在他十个儿女里，至少能够资助其中五位成为经济上不依赖其它社团资助的海外传教士。在他尚未成年时，他的大姐就已经在中国传道。

### 2. 个人的心志

巴富羲在童年时就向讲台上的牧师递交过一张亲手签名的发愿卡，上面写着：“我年轻，健壮又自在，尽力作我能作的事；为了真理，公义和你——生命的主，我来就你。”

他成年后也在和家人的通信里这样写道：“我在 1926 年取得医师资格之后，一直以为神呼召我的时刻即将到来，……你知道 W 医生有三、四年一直希望我去他那里工作，……然而我始终觉得那不是我该去就业的地方，因为心里总感到有去国外传道的可能。”（《何竟如此》p10）

### 3. 呼召的真确

巴富羲在 1931 年 6 月偶然看到中国内地会刊“亿万华民”中一位匿名的中国传教士写的文章后，他去信报名参加内地会发起的“二百人”来华运动时，是这样写的：“过去我一直向往去非洲传道，但上周六晚上，当我拿起本期“亿万华民”，并读完那篇呼吁青年到中国去的文章之后，便再也无法抗拒圣灵的感动，不得不提笔写这封申请的信。”（《何竟如此》p10）

在受邀参加内地会在斯梅西克的大会以后，他的生命发生了奇妙的改变，以致他在给妹妹的信里这样写道：

“现在我感到奇怪——真不明白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如果你在这里，我会当面向你详述。此前我的内心曾月复一月的感到压抑，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而如今神已成就了他的美意。”（《何竟如此》p11）

“在斯梅西克的日子虽然极其美好，但我仍觉得尚未站到最蒙神赐福的地位上，因为总想保留一点自己的权利，所以内心未享受



完全的安息。当我进入内室，用半个小时和神交通之后，里面那一点不愿顺服的心态消失了，我不希望它再回来，因为神给了我百倍的报偿，多么奇妙！如今我渴望到中国去了，而此前却一直不愿考虑是否会去中国……。”（《何竟如此》p12）

甚至他在给当时的病人的信里也这样写道：“现在我明白，顺服就是喜乐，再无苦恼也无内心和思想上的争斗，我的心已经完全与神谐和。”（《何竟如此》p13）

既然他有良好的家庭教导；有为主做工的心志；又有圣灵明确切实的引领为什么还会在赴新疆宣教的果效上看起来似乎乏善可陈呢？这时，我重新回到了本书的题目上，再次看到所引用的经文：

“何竟如此枉费香膏呢？”（可 14:4，和合本作：“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价值 30 两银子的香膏，就这样枉费在耶稣的身上，如果换成银钱，可以救济多少穷人同时也为自己扬名，岂不胜似只散发一阵子香气吗？

但耶稣基督却告诉我们，“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甚至还讲“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作的以为纪念。”如果我们抛开其它经文言及膏主的意义，单单就事论事，恐怕谁都不会认为耶稣基督此说合乎情理。正如我们按照正常逻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虔诚的财主奉献巨额银钱，在耶稣基督的眼里会比不上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

我们可以再同过头去看看，是怎样的文字和警句，使巴富羲医生放弃在英国的优裕生活，毅然为主赴华宣教，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候仍有不曾动摇的信心和心志：

“如果舒适的本国生活，拦阻你去中国为主受苦，那末，尽管你在本国能完成许多工作，但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却不能存留；反之，如果你清楚神的旨意并遵行，到中国去，你生命的火花就不会熄灭，将永远闪烁在拯救灵魂的圣工之中。”（《何竟如此》p56）

我们除了知道他毅然决定写信报名参加“二自人”来华运动之外，对于他来华宣教还有怎样的认识和期待，只能从他到达新疆以

后，写给家人回顾自己旅程经历的信里，略窥一二。

“你肯定会记住这个日子（1932 年 12 月 31 日），一年前的今天，我在维多利亚车站向你们告别……，今天有多少该向神称颂的事啊！真的，我几乎被回顾一年来神为我施行诸多奇事的纷繁思绪所淹没。日前我对自己说，我为主舍弃的何等少，我对主赐给我的丰盛恩典有了更深的领悟。假如十八个月之前，我能预知这一年中的遭遇，无疑会感到代价太大，付出太多了；但如今我会静下来思考，我为主舍弃了什么？这样的反思使我对现状完全知足，并有真正的喜乐……，我已学会了透过主去看待各种困难，而不是透过各种困难来看主……。”（《何竟如此》p48）

“如果一个人能毕生无条件的向主降服，那么主要为他做的事和主要用他去做的事，都将是没有限量的。我深信这就是蒙福的秘诀——当然说说容易，要行出来就是另一回事了。一个人只有靠着圣灵的帮助，才能向主降服，向主降服和勉强顺服神的旨意是不同的，降服不是消极的事，而是非常积极的事，降服建立在坚固信心的基础上，深信神为祂自己荣耀的缘故，必定悦纳向祂献身的人，对我而言，领悟这一亮光是近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何竟如此》p48）

“像这类远征计划，一般都必须由对全部行程都很了解的人士制定；然而我们此行，则完全显明是主奇妙的引领。……或许主的旨意向我们悟性迟钝的人显明会稍晚一些，延迟显明他的美意，甚至没有显明，无论如何我都深知，他的美意必定成全。”（《何竟如此》p57）

“你一直寻求神所作的一件“新事”。如今我对“新事”有了蒙福的领悟，当我不再按原来刻板的思绪去理解“新事”的时候，便惊奇的发现在神的宝库里有无尽的新事。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中神要作的“新事”，是一个永不失效的现实应许，哦，我们所以贫穷，不正是因为不能坚信神的应许吗？近来在读经时，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尚未得着的应许。”（《何竟如此》p57）

从他这些私人信件的字里行间，我们都没有找到对宣教果效的预计和评估、对福音工作的展望和期待，有的只是向神的彻底顺服以及对神应许的无比信心。这时，我们似乎可以理解那感动伯大尼马利亚和 1000 多年后同样感动苏格兰巴富羲医生的是怎么了，那就是真实与主相交并被主得着后完全奉献的心志。

香膏为谁倾倒，生命为谁舍弃，他们做这一切的目的，究竟是为了谁？这是一件美事，因为作在了耶稣基督身上，而且完全是为耶稣基督而作的。耶稣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作的以为纪念。”（可 14:6、9）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上 15: 22）神借着先知的口如此显明祂对我们的心意，当巴富羲将自己顺服和敬畏的心全然献在神的祭坛上时，神的心自然就得到了满足。正如作者在文中所引用的诗一样：

“再进一步，他达到了人生的终点；  
再说一语，他干完了终生的工作；  
再劳一刻，他背尽了基督的十字架；  
夕阳西沉，一日工成。”

（《何竟如此》p54）

作者和译者都在本书里提及，他们和身边的家人及主内肢体是如何为巴富羲医生的事迹所感动；得安慰；甚至受激励的。他榜样的力量一直鼓舞着一批又一批志愿者为主全然奉献，破碎自己，走上主的十架归路。也许当年那首西北灵工团赵西门弟兄所写的诗歌《十架归路》，表达了一代又一代为主舍命的传教士们的心声：

我心饥渴的爱慕，十字架的归去路，火的时代催我走，不容稍有所踟蹰，认定十字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归途，认定十字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归途。

这条十架的归途，凄酸痛苦多云雾，常经软弱和干枯，多有眼

泪和伤处。然而主慈手常搀扶，领我前进不后顾，然而主慈手常搀扶，领我前进不后顾。

我宁拣选十架苦，不愿拣选平安路，我愿流血秦国道，不愿偷生在斯土。甘受十字架的羞辱，与主同尝杯中苦，甘受十字架的羞辱，与主同尝杯中苦。

十字架的归去路，本是漫长的征途，有血有泪有争战，多风多雨多险阻。几千年来的殉道血，都在这条路上流出，几千年来的殉道血，都在这条路上流出。

随主到客西马尼，随主到髑髅疆土，最后进入永远家乡，再无悲痛黑暗云雾。

请容许我最后引用作者的感言，作为本文的结束：“人的生命是不能用在世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其价值的，斯多克博士在论及大卫·布兰纳德时说：‘他死后为他所著的传记，要比他生前的工作更有效’。瞬时所播下的种子，要经历几个季节的发芽和生长才有收获。谁会用主耶稣活在世上的时间，来衡量他生命的价值呢？我们自己往往只了解历史的表象；惟有爱才能明白其中的奥秘。”（《何竟如此》p6）